



四川外国语大学

教育发展研究院

主办

外语院校发展参考

The Developmental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s

2017年5月3日

第1期（总第18期）

高等教育 “十三五” 发展规划专刊

要目

-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 ★解读“十三五”：教育改革和发展之路
- ★教育部等五部门放大招：高校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到高校
- ★以分类管理推进高校科学定位和特色发展
- ★美国南加州大学战略规划体系研究与启示

目 录

★ 政策文本摘要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1
★重庆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9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	12

★ 院校发展动态

★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15
★解读“十三五”：教育改革和发展之路.....	16
★“十三·五”期间东西部人才流动政策引导.....	18
★委员张明华：以高水平大学支撑新兴城市创新发展.....	19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20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	22
★以分类管理推进高校科学定位和特色发展.....	22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	23
★教育部等五部门放大招：高校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到高校.....	27
★破解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28
★清华北大智库专家做客光明网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发展的贡献.....	29

★ 地方动态

★转向应用型，地方本科需要突破.....	30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何犹豫不决.....	32
★地方高校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实践探索与发展策略.....	33
★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面向世界培养工程型创新人才——以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为例.....	37
★重庆 10 余所市属高校试点转型 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40

★ 海外视野

★美国南加州大学战略规划体系研究与启示.....	41
★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培训理念及启示.....	43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一、以新理念引领教育现代化

(二)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领教育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着力优化教育结构，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推动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三、改革创新驱动教育发展

(一) 着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实行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促进文理交融。继续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推动高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改进专业培养方案，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学习支持体系。建立支持和奖励机制，激励教师面向经济社会新需求，强化课程研发、教材编写、教学成果推广，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企业先进技术等转化为教学内容。探索建立适应弹性学习、学分制和主辅修制的教学管理制度，逐步扩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教师的权利。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和研讨式学习方式，加强个性化培养。改进教学评价机制和学生考核机制。全面落实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建立约束激励机制，调动教师投入本科教学、不断探索教学新技术新方法新形态的积极性。推动高校统筹使用相关经费，加大对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常态化投入，强化实验、实训、实习环节，建立高校与企业、行业、科研机构、社区等合作育人机制，全面提升高等学校教学水平。

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扩大高校学术团队招收研究生的自主权，适度提高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加强重大基础研究、重大科研攻关方向、重大工程领域、重大社会问题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承担国家和区域重大科研任务，强化博士生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培养科技创新前沿的领军人才。支持在职人员以非全日制方式攻读专业硕士学位，鼓励跨学科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加强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开放式培养模式，推行“双导师”等行业企业联合培养机制，结合承担行业企业实际科研生产项目，加快培养能够解决一线实际问题、宽口径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健全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动高校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强化研究生课程的系统性和前沿性，加强不同培养阶段课程的衔接，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三) 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和各类学校管理制度建设。全面落实“一校一章程”。加强对新设立学校和升格、更名、合并、分立的高等学校的章程核准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办学的管理制度和监督办法，推动学校依法依规治校。完善公办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议事规则。深化学校管理人员职员制改革，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克服行政化倾向。拓展师生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学校重大决策和涉及师生利益的重大政策应当经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发挥学生代表大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完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理事会制度。切实实行学术民主，保障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职业学校专家委员会履行职责。

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健全各部门统筹推进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会商机制。统筹推进高校综合改革，改革学位授权审核机制，落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积极

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落实高校岗位管理自主权；自主制定招聘条件和标准，自主公开招聘人才，根据岗位设置方案和管理办法自主做好人员聘后管理，落实高校用人自主权；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落实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自主权；健全符合现代大学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扩大高校薪酬分配自主权；精简对高校经费使用的考核评估，扩大项目资金统筹使用权，落实高校经费使用管理自主权；简化高校建设项目审批程序，扩大基本建设项目自主权；改进高校政府采购管理，优化进口仪器采购服务，落实高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自主权；根据学术交流、教育教学和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改进相关管理制度，为高校教师因公出国、参会提供便利。推动高等学校进一步向院系放权。

（四）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建设与改革并重，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统筹高校整体建设和学科建设，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支持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全面建设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支持拥有若干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大学前列；支持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通过建设进入该学科的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支持省级政府根据国家建设布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自主推动区域内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积极探索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一流建设之路。

创新建设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增强建设实效。创新支持方式，综合考虑建设高校基础、学科类别及发展水平等，通过不同途径给予相应经费支持，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坚持公开透明，实施动态监测，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办法，开展中期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强化社会监督。建立退出机制，打破身份固化，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激发高校的建设活力。改革完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组织实施方式，推动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协同创新。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加强总体规划，引导分类发展，科学合理布局，坚持扶优扶新、扶需扶特，支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具备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基础和实力的大学，支持建设100个左右学科，重点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加强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重点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积极发展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覆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重点领域，努力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建设体系，大力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建设高校及学科实行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需求，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总体要求，创新体制机制，深化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和国外科研机构的合作，汇聚创新资源和要素，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全面提升高等学校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抢占世界科技创新制高点。

（五）强化高校创新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等学校全面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优化布局、分类整合的基础上，统筹研究建设国家级科研基地，组织和支持高校积极参加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和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优化高校基础研究环境，充分发挥学科、人才优势，凝练主攻方向，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战略技术问题开展基础技术、前沿技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研究，以基础性的突破带动全局性的创新。支持高校根据国家对外科技合作总体部署，提出并牵头组织、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高校图书馆建设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促进高校创新提供服务。

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完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制度，形成经费长效支持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地方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研究型大学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落实高校科研项目预算调整、间接费用统筹使用、劳务费分配管理、结转结余资金按规定使用等自主权。探索实行充分体现人才创新价值和特点的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发挥科研项目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明确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提高间接费用比重，加大绩效激励力度。推动高校切实履行法人责任，健全科研经费内部管理办法。多种形式加强高校科研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教师在岗兼职、离岗创业等制度。设置特定的创新科研岗位，聘用海外学者、国内同行和研究生，组织科学创新团队。改革科研评价制度，建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同行专家遴选机制和专家库，加强评价专家的自律和责任追究。

深化全方位协同创新。支持高校探索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科研组织模式，开展跨学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协同创新。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和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面向社会和企业开放科研基础设施和创新资源，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以及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的开发攻关，以增强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支持高校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实验室，推进产业技术国际创新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继续实施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努力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通过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积极参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深入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深入开展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实践经验总结研究。积极参与实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加大相关人才计划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支持力度。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体系，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重点建好一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题数据库和文科实验室。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加强国别和区域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支持高校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建设一批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统筹规划高校各类科研机构、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建立形式多样、结构合理的高校智库。深化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综合改革，重点建设一批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建立咨政研究核心人才库，培养一批复合型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支持高校举办高层智库论坛，打造智库成果发布品牌。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完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利益分配机制，赋予高校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自主权，调动高校、科研机构 and 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健全技术转移应用机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建立知识产权运营、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队伍，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应用的有效机制，推动建立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建好一批大学科技园、产业创意园和试验区，孵化和扶植一批科技与文化骨干企业。

四、协调推进教育结构调整

（四）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合理布局。推动地方开展高等学校分类管理改革试点，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研究制定高校分类设置、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等制度，努力形成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的局面。改进高等院校设置和招生计划管理办法，探索建立高校办学条件预警机制和退出机制，引导地方着力办好现有高校，强化省级人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规划，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新的城镇化地区、产业集聚区、边境城市延伸。优先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小规模有特色学院。加快建成一批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高水平应用型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根据高等学校设置制度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

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推动各地开展转型发展试点，加强对改革试点的统筹指导，加快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总结推广试点典型经验。充分发挥试点高校改革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示范引领作用，引导高校从治理结构、专业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结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把办学定位转到培养应用型和技术技能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把办学模式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到“十三五”末，建成一批直接为区域发展和产业振兴服务的中国特色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支持一批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重点加强实验实训实习环境、平台和基地建设，鼓励吸引行业企业参与，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的实验实训实习设施，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创新。

提高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比重。新增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主要向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倾斜。稳步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比例，积极稳妥推进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增计划主要用于紧缺人才培养。加快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推进军民融合，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做好普通高校国防生培养工作，扩大高等学校与军队合作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规模。

（六）加快培养现代产业急需人才

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扩大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除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等特殊行业的学科和专业实行国家管理外，学校依法自主设置专业。加强专业设置政策引导，及时修订中职、本专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目录，调减社会需求不足的长线专业。推动高校加快新兴交叉学科建设，通过专业改造等方式设置复合型专业。发挥行业协会与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作用，探索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人才需求预测机制，完善资源配置机制和评估评价机制等，引导学校围绕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形成办学特色。

服务现代产业的新兴学科专业集群建设

建设一大批以校企合作为基础，集人才培养、继续教育、科研创新、科技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集群，校企联合开发课程和教学资源，联合培养培训师资队伍，共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优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建设一批集成电路实训基地，构建我国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学科专业集群，加快人才培养和产业关键技术研发。

大力培养现代农业人才。加大对涉农学科专业的投入力度和学生资助力度，推进涉农学科、专业现代化。深化农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培养现代农业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充分发挥农业院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人才培养和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网络。

加快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人才。面向“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支持高水平大学加强制造业相关核心技术学科、专业建设，支持职业学校开设先进装备制造和基础制造相关专业。继续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先进制造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加快培养急需工程技术人才。扩大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规模。服务国家“互联网+”行动、大数据战略，打破传统学科、专业局限，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硬件、集成电路等新兴学科专业，加快培养信息技术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加强现代服务业和社会管理服务人才培养。完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金融、涉外法律、国际交流、旅游、健康、体育以及涉老等领域的新型专业人才。完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为贫困地区和农村基层定向免费培养全科医学人才。加强儿科等紧缺人才培养，支持儿科医疗资源短缺的地区在有条件的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专业。支持建设康复大学，加快培养康复人才。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积极推动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聘培养制度改革，加强公安专业人才培养。

五、协同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四）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改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按照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大学生的目标要求，实施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范专业领域人才培养基本要求，鼓励行业部门（协会）制定人才评价标准，推动高校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和评价办法。坚持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学习、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坚持高校学生学习过程性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严格课程考核标准和管理，探索基于真实任务的评价方法，注重考核学生运用知识系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统筹推动教育开放

（一）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布局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构建教育共同体，开展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丝路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重点合作，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校

学历互认、师生互换，建立更加密切的教育合作交流机制。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和职业学校配合企业走出去，建立办学机构、研发机构。

分类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教育务实合作，形成重点推进、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以优质资源请进来为重点，深化与发达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以教育走出去为重点，扩大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合作交流。加强与东南亚、非洲国家教育合作。增进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孟中印缅、中蒙俄等重要廊道及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区域教育合作交流。加强与有关国家语言人才培养合作，加快培养各类非通用语种人才。

打造区域教育对外开放特色。支持东部地区整体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率先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支持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不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沿边地区利用地缘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教育合作交流。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在中国政府奖学金中设立“丝绸之路”项目。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遴选一批具备一定学科专业、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国别研究基础的高校和职业学校，建设一批“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地，专门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吸引研究相关国家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华任教，开展“一带一路”国别教育、语言文字、经济、法律、文化、政策等决策咨询研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一批外语非通用语种新专业，培养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

（二）提升教育开放层次和水平

提高留学教育质量。优化出国留学服务工作，健全留学人员信息化管理服务机制，完善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完善派遣政策，充分发挥国家公派留学对高端人才培养的调控补给作用，加快培养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建立来华留学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提高师资和课程的国际化水平，加强来华留学管理与监督，提升来华留学服务水平，稳步扩大来华留学规模。更好发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引领作用，创新奖学金管理模式，加强精英人群培养。做好来华留学校友工作。

深化中外学校间交流与合作。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与国外学校建立友好学校关系，开展多渠道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支持职业学校和应用型高校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课程资源，鼓励中外职业学校教师互派、学生互换。支持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及科学联合攻关，依托优势学科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论坛，打造高端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完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出国交流、国际会议、外事接待等管理制度，开展大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海外研修培训，鼓励支持教师更广泛更深入地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完善准入制度，简化审批程序，完善评估认证，强化退出机制，加强信息公开，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合作办学成功经验共享机制，突出合作办学对学校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重点围绕国家急需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类专业建设，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一批示范性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鼓励和支持职业学校与国外一流职业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鼓励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在优势学科领域合作举办非独立设置的二级学院，共建研究机构，建设一流学科，推动国内高校和职业学校提升办学水平。

（三）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深化多边教育合作。推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高层定期磋商机制，巩固提升合作水平。完善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教育部长会议机制，完善金砖国家教育合作机制，拓展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的教育合作空间，以学分互认为重点，推动学生交流，深入参与相关多边教育行动。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机制，有计划地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

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加强对各类国际重大教育规则的研究，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主动在全球教育发展议题上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创新方式，推广我国教育评估认证标准和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强化我国在国际教育治理中的负责任形象。

开展教育国际援助。进一步做好教育对外援助，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统筹利用国家和民间资源，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外基地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管理人员、教师、学者和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

一体化援助。结合我国对外援助项目，鼓励教师与青年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参与项目建设和提供志愿者服务。

（四）统筹推进中外人文交流

完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发挥人文交流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的支柱作用，深化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人文交流，加强部门间协同，整合凝聚社会力量，打造一批中外人文交流品牌项目，推动形成机制多层次和区域全覆盖的人文交流良好格局。整合搭建政府间教育磋商、教育领域专业人士务实合作、教师学生友好往来平台。拓展政府间语言学习交换项目，联合更多国家开发语言互通共享课程，推进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提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的能力。

办好孔子学院。坚持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完善孔子学院布局。大力加强中方合作院校支撑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体系，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院长和教师专职队伍，大力培养各国本土汉语师资。办好孔子学院院长学院、示范孔子学院、网络孔子学院，鼓励中资机构、社会组织等参与孔子学院建设，不断提升孔子学院（课堂）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深入实施“孔子新汉学计划”，深化与世界各国语言文化交流，支持各国将汉语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广泛地学习和使用汉语。

（五）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合作交流。

完善内地和港澳教育合作与交流机制。支持港澳加强青少年学生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加强内地与港澳在师资、课程、教材、教学、考试评价、督导等领域合作。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吸引港澳学生到内地就学。提升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水平，创新方式、扩大规模、加强利益关联、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内地和港澳教育共同发展。

打造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交流合作平台。支持两岸教育工作者交流教育发展理念。加强学生交流互访。扩大两岸高校学历互认范围。做好招收台湾学生来大陆学习和大陆学生赴台就学工作。完善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合作机制。

七、全面提升教育发展共享水平

（七）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和就业引导，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拓宽就业渠道，引导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做好基层就业项目、大学生征兵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建立精准就业服务机制，提高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水平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力度，重点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农村生源、残疾毕业生等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

八、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落实大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开展多种形式的师德教育，把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法治、心理健康等教育融入培养、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推动各地各校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办法，构筑覆盖各级各类学校的师德建设制度网络，推动学校针对师德建设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学校领导干部带头，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学风、教风、作风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工作手段和载体，开辟思想教育新阵地，抓好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培训，组织广大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引导广大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加大对新入职教师、海外留学归国教师的国情国史教育力度。大力宣传和表彰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提升教师职业的崇高感和荣誉感。

完善师德师风考评监督机制。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学校工作考核和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把师德师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首要内容，建立个人自评、学生测评、同事互评、单位考评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考核机制，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师风监督体系。

完善师德表彰奖励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依法依规加大对各类违反师德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对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在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制，将表现恶劣的清除出教师队伍。建立师德事件及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掌握师德师风信息动态，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

（二）提升教师能力素质

推进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办好一批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改进教师培养机制、模式、课程，探索建立教师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做好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完善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和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创新，着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继续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扩大教育硕士招生规模，培养高层次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完善教师校长培训体系。落实中小学教师校长五年一周期不少于360学时的全员培训制度，实施新一周期教师校长全员培训。建立培训学分与教师管理结合机制，构建教师校长培训学分银行，加强教师校长网络研修社区建设。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能力建设，整合高等学校、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和中小学校优质资源，建立中小学教师校长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加强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组织专业课教师定期参加企业实践，完善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推进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加强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建立健全高校教师继续教育与培训制度，重点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加强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提高特殊教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健全和强化各级各类学校教研制度和机构，加强教研队伍建设，发挥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鼓励青年教师参与教学团队、创新团队。开展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培训，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全面开展依法治教和教育信息化领导力培训，提升校长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现代教育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素养。注重专业培训，提高少先队辅导员和大学辅导员队伍工作水平。

培养造就教学名师。在国家和省两级认定一批教学名师，鼓励教学名师交流讲学，在全国各地带动造就一大批高水平教学人才。吸引优秀教师到中西部农村任教。鼓励教师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形成教学特色，造就一批教育家。

（三）吸引一流人才从教

吸引优秀毕业生从教。完善师范院校提前批次录取的办法。完善免费师范生制度体系，吸引优秀学生读师范当老师。鼓励重点高校为非师范专业学生提供教师教育课程服务，畅通非师范专业毕业生从教通道。落实完善毕业生到乡村学校服务的学费代偿政策，吸引优秀毕业生到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

大力引进行业企业一流人才。允许高校和职业学校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吸引具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高科技人才及各类高级专业人才兼任任教。鼓励应用型高校和职业学校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担任兼职教师或专业带头人。力争到2020年，应用型高校和职业学校有一大批行业企业认可的领军人才。

建设高校一流人才队伍。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落实好“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改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大力培养引进学科领军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实行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对国家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精准引进。完善引才配套政策，解决引进人才的任职、社会保障、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配合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改革，健全外籍教师资格认证、服务管理等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人文社科领域和青年人才支持力度。

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学校领导人员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充分结合学校特点，遵循领导人员成长规律，选拔任用讲政治、懂教育、善管理、敢担当、作风正的优秀人才担任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出台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严格任职资格条件，健全选拔任用制度，拓展选人用人视野；加强领导人员培养教育和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统筹推进交流，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加强人文关怀，造就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出台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任职资格条件，规范选拔任用工作，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强激励保障，建立和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支持学校领导人员依法依规履行职责，鼓励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优秀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家。

十、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

（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机制。理顺领导管理体制，明晰政治责任要求，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向基层延伸。推动各级党组织建立完善党建工作责任制。明确党组织主体责任和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以及分管责任人的直接责任，强化班子成员“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问责追责，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在机关和高校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逐层传导压力，逐级落实责任。推动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把“三严三实”要求贯穿于党建工作始终，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从严要求、管理和监督干部，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切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深入纠正“四风”问题和教育行风问题。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巡视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

（二）加强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完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落实教育系统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建立完善定期研究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加强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联系指导，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项巡视和督查，强化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和党内情况通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问责机制。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在教育政策制定、教材编写审查选用、教学科研管理、教育媒体管理、对外合作交流等业务工作中，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强化思想引领，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做好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和知识分子工作，着力提升党员干部师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加大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组建力度，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选好管好党组织书记，加大党务干部培训力度，定期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提升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立足思想建党，深入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督促党员按规定缴纳党费，规范党员党籍和组织关系管理，引导党员增强主体意识和党性观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制度治党，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从严落实教育系统机关党建工作制度，完善各级各类学校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体系、骨干力量、党建责任制、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等制度，使制度规范覆盖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神经末梢。出台加强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and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注重发展优秀中青年教师和学术骨干入党，认真做好在高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提高新发展党员的政治素质。公办高等学校以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根本，充分发挥党委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探索完善高等学校院系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院系党委（党总支）的政治功能与作用。中小学校党组织要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高度重视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党组织，建立党组织参与决策和监督机制，探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强化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导，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统战工作。以加强基层党建带动学校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和学生会组织建设。

（四）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以尊崇《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核心，以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重点，全面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干部，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意识，落实廉政风险防控举措，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监督执纪问责。聚焦主业、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大执纪审查力度，锲而不舍正风肃纪，以案说纪，加强警示教育作用。完善教育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推动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重庆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第二章 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第二节 发展目标

重庆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主要目标表

	指标	2015年	2017年	2020年	“十三五” 变化情况
学前教育	在园幼儿数（万人）	91.6	93.0	105.0	13.4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81.0	84.0	90.0	9.0
	在园幼儿普惠率	73.0	77.0	85.0	12.0
义务教育	在校学生数（万人）	303.4	317.4	334.1	30.7
	其中：普通小学	207.3	222.1	226.0	18.7
	普通初中	96.0	95.4	108.1	12.1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3.4	≥94.2	≥95.0	≥1.6
高中阶段教育	在校学生数（万人）	108.6	102.7	98.7	-9.9
	其中：普通高中	62.3	60.0	58.7	-3.6
	中等职业教育	46.3	42.7	40.0	-6.3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3.1	95.0	97.0	3.9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万人）	103.0	106.0	110.0	7.0
	其中：研究生（万人）	5.1	5.5	6.3	1.2
	普通本专科（万人）	71.6	74.3	76.2	4.6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0.5	43.0	50.0	9.5
人力资源开发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9.4	9.6	10.0	0.6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3	10.6	11.0	0.7
教育投入	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17.0	18.2	≥20.0	3.0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四节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市委、市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推动重庆高校合理定位、突出特色，提升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进一步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努力创建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落实部市共建高校协议，提高共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支持符合国家政策、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需求、满足基本条件的高校增列为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优化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机制，支持参加国际专业教育认证，提升专业建设与发展水平。以“三特行动计划”为基础，以“双一流”为统领、形成新的特色示范专业和专业群。大力实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实验教学平台建设计划”、“优质课程资源、慕课平台建设计划”等，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探索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提升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按照培养目标要求，实施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范专业领域人才培养基本要求，鼓励行业部门（协会）制定人才评价标准，推动高校制定各专业人才

培养标准和评价办法。强化评估的导向作用，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估，完善质量监督和保障体系。

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引导高校围绕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新常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结合学校自身发展实际，找准定位，分类发展，建设一批综合研究型、应用科技型、技术技能型高校。到 2020 年，各高等学校发展定位和目标更加明确，优势特色初步显现，建成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学科和专业，与产业发展和创新驱动紧密相关的学科和专业比重及人才培养规模显著提升。重点建设 200 个重点学科，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市级重点学科，15 个学科进入教育部学位中心学科评估前 10%，22 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前 1%，30 个左右专业点进入国内前列，高校综合排名有所提升。重点在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医药化工、环保、软件、物联网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支持建设 260 个本科特色示范专业点、70 个特色专业群；1000 个服务地方支柱产业的高职（专科）专业点、150 个高职（专科）骨干专业点。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坚持把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以健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以完善条件和政策保障为支撑，紧扣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健全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师能力、加强创新创业实践、改革教学管理制度等关键环节，构建适应城乡经济发展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健全融通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布局高校众创空间，建设示范性众创空间，布点市级创新创业教学资源研发中心，遴选千名技术技能专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风险投资人担任高校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老师，建设学生集中实训平台，创新政府购买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服务制度，建立国家、市级、校级覆盖全体学生的“以赛促学”体系，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具有重庆特色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创新创业教育和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良好环境。

促进市属高校转型发展。探索出台激励政策，引导部分市属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或向产教融合型深化，采取“两转两补”方式，扩大高校试点面。鼓励公办市属本科高校和民办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转型发展为应用科技型高校，引导高职高专学校向产教融合型深化。有意愿、有条件的高校可以整体试点，也可以选择部分二级院系或部分学科、部分专业、部分课程试点。支持市属高校开展与国外应用类型高校国际合作和国内外企业的校企合作项目。指导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支持其设立转型发展基金等形式，实现联盟内的互联互通、互助互补。到 2020 年，建成 1-2 所在国内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特色高水平应用科技大学，建成一批产业贡献力大、价值创造力高、结构带动力强的应用科技型和技术技能型高校。

增强高校科研创新能力。深化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计划”），持续支持一批绩效良好的市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引领高校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深入实施“高校科研基础能力建设计划”，优化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用技术推广中心等创新平台的布局，打造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契合的重点项目。深入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建设新型高校智库。实施“高校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加强成果转化机构和产学研合作基地建设，探索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落实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激励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加大高校科研经费投入，调整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每年从高校财政补助教育经费中安排 8%-10%，重点支持应用技术和试验发展。建立健全高校科研和金融结合机制，完善多元化科技创新融资体系。到 2020 年，打造一批高水平科研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创新平台、研发基地和新型智库，推进重大科技成果、哲社科成果的不断涌现，提升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高等教育
争取政策，支持一批符合条件的高校开展博士、硕士人才培养工作，支持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科技学院分别完成“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硕士人才培养项目验收工作。新增 15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工程硕士领域。建成 200 个市级重点学科、15 个特色学科群，15 个学科进入教育部学位中心学科评估前 10%，22 个左右学科进入 ESI 排名前 1%。建设 150 支研究生导师团队、180 门研究生优质课程、100 门案例库、200 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及 2000 项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支持建设 260 个特色示范专业，70 个特色专业群，1000 个服务地方支柱产业的高职（专科）专业点、150 个高职（专科）骨干专业点。建设 50 个实验教学（虚拟仿真）示范中心，15 个市级教师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5 个政府购买实习服务试点，建设 20 个大学生公共实习实训基地。 建设 10 个市级创新创业教学资源研发中心，资助 50 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建成市级高校学生工作创新项目 100 个，建成集毕业生创业就业服务、就业指导、创业培训和创业项目孵化等于一体的市级大学生创业就业服务基地 1.5 万平方米。

推进一批试点高校整体向应用型转变或向产教融合型深化，40 个二级学院，120 个学科、专业、课程向应用型转变或向产教融合型深化。建成 1-2 所在国内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特色高水平应用科技大学。建设高校部市级重点实验室 50 个，部市级工程研究中心 40 个，市级高职院校应用技术推广中心 30 个，市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40 个，省部共建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2 个，择优支持一批效益突出的市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推动 200 项高校优秀科研成果转化（其中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各 100 项）；建设高校市级创新团队 120 个，高校市级众创空间 100 个，建成新型高校智库 10 个。

第七节 提升教育开放水平

开展涉外办学。鼓励重庆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与国外高水平、有特色的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围绕国家和重庆急需的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建设，引进国外优质资源来渝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统筹多方资源，鼓励有条件的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有序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办学机构或参与国外院校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配合企业走出去战略，开辟境外办学市场。加强孔子学院建设，有效发挥孔子学院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加强涉外办学质量内涵建设，建立办学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相结合的质量保障和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主体多元、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开放办学格局。

推进海外引智。支持高校依托“千人计划”、“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项目加快引进世界名校师资。继续实施“巴渝海外引智计划”，引进一批高水平外籍专家、资深华裔学者来渝开展教学和科研合作。多渠道、有计划地开展长短期外籍教师聘请工作，通过健全评估和激励机制，逐步提高长短期外籍教师聘用效益。

促进国际合作。瞄准“双一流”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校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实质性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及科研人员出国研修选派力度；积极开展学生交换、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大力开展科学联合攻关，主动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着力培育产学研国际协同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以及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深入实施“留学重庆计划”，优化学生结构，加大品牌专业、品牌课程建设力度，有效提升教育质量，扩大来华留学规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共建丝路合作机制，加强重大产业技术、产业政策合作，加强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围绕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研究。依托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与新加坡开展广泛深入的教育合作与交流。用好各类教育对外交流宣介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继续加强中小学生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理解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

加强国内合作。强化长江流域城市间沟通协调，建立沿线城市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争取教育部政策支持，加大与东部发达省区教育交流与合作力度，扩大东部高校与我市高校结对帮扶合作，建设城市间公共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引导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资源与长江流域产业的有序匹配和对接。进一步完善成渝区域间教育合作，重点支持成渝经济区腹地城市间教育交流合作，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逐步扩大到黔、云两省，集聚区域内高水平大学资源，通过协同创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对外交流

全市接收长短期留学生达到 1 万人次，打造 8-10 所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学校。我市高校海外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 3-5 个，建设 3-5 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及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全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达到 80 个。实现“两个两千”目标，全市高校各类公派出国教师规模达到 2000 人/年，全市高校引进外籍专家及教师达到 2000 人。推动国际化“五类人才”项目的培养。

建好重庆非通用语学院，开设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小语种约 3-5 个，开展国别及区域研究、重大产业技术、产业政策、合作战略研究的机构约 3-5 个，打造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交通、法律、财经、物流等领域提供人才支撑的一批标志性成果。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专项奖学金项目。

强化长江流域城市间沟通协调，建立沿线城市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争取教育部政策支持，加大与东部发达省区教育交流与合作力度，扩大东部高校与我市高校结对帮扶合作，进一步完善成渝区域间教育合作，重点支持成渝经济区腹地城市间教育交流合作，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逐步扩大到黔、云两省，集聚区域内高水平大学资源，通过协同创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激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创新人才，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完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机制

（一）改革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深入推进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省级学位委员会负责审批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和博士学位授权初审。稳妥推进部分高校自主审核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对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加强授权监管，完善学位授权准入标准，强化专家评审环节，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对于不按照标准和程序办理、不能保证质量的，依法责令限期整改，直至撤销其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二）改进高校本专科专业设置。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外，高校自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的专业，报教育部备案；自主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支持高校对接产业行业需求，经学科和产业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后，按照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加强专业建设信息服务，公布紧缺专业和就业率较低专业的名单，逐步建立高校招生、毕业生就业与专业设置联动机制。开展专业设置抽查，对存在问题的专业，责令有关高校限期整改或暂停招生。

二、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

（三）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制订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积极开展试点。试点高校人员总量实行动态调整。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机构编制、高校主管部门发现高校在人员总量管理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等严重问题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四）高校依法自主管理岗位设置。高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人员总量内组织制订岗位设置方案和管理办法，并主动公开，接受监督。岗位设置方案应包括岗位总量，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类岗位的名称、数量、结构比例、职责任务、工作标准、任职条件等。

（五）高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高校根据办学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研、行政职能部门等内设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改革后要保障高校内设机构人员享有相应的晋升、交流、任职、薪酬及相关待遇。

三、改善高校进人用人环境

（六）优化高校进人环境。高校根据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需要，自主制订招聘或解聘的条件和标准，自主公开招聘人才。政府各有关部门不统一组织高校人员聘用考试，简化进人程序，为高校聘用人才提供便捷高效的人事管理服务。高校在人员总量内聘用人才要围绕主业、突出重点、支持创新。

（七）完善高校用人管理。高校根据其岗位设置方案和管理办法自主做好人员聘后管理。对总量内人员，高校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在人员总量外，高校可自主灵活用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履行合同，规范实施管理，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高校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制订教师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办法和离岗创业办法。

四、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

（八）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高校自主制订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操作方案。职称评审

办法、操作方案报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高校主管部门备案。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监管，对高校职称评审工作进行抽查，对因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高校，要给予警告、责令整改；对违法违纪的责任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处理。

（九）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高校要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四、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

（十）支持高校推进内部薪酬分配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有关部门要支持高校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的内部分配机制，实行符合高校特点和发展要求的内部分配政策。高校要理顺内部收入分配关系，保持各类人员收入的合理比例。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

（十一）加强高校绩效工资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充分考虑高校特点，重点加大对高层次人才集中、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高校的倾斜力度。高校根据备案人员总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层次等因素，自主确定本校绩效工资结构和分配方式。绩效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倾斜。高校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

五、完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

（十二）改进高校经费使用管理。财政部门要完善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优化高等教育拨款结构，加大基本支出保障力度，基本支出占比较低的地方要进一步优化结构，合理安排基本支出。改进项目管理方式，完善资金管理辦法，采取额度管理、自主调整等措施，进一步扩大高校项目资金统筹使用权。进一步完善高校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划分，逐步扩大财政授权支付范围，逐步实现用款计划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项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报。

（十三）扩大高校资产处置权限。适当提高资产处置的备案和报批标准。高校自主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应淘汰报废的资产，处置收益留归学校使用。税务部门要执行好各项涉及高校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校要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加快财政预算执行进度，完善内控机制，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按照规定管好用好各项经费和资产，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高校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有效使用。高校应依法接受审计监督。

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

（十四）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对本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对本校党的建设全面负责，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强化院（系）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院（系）党委（党总支）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高校基层延伸，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十五）加强制度建设。高校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和教育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依法依章程行使自主权，强化章程在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方面的基础作用。完善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财经纪律，对工作中的失职失责行为要按有关规定严格问责。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抓紧修订完善校内各项管理制度，使制度体系层次合理、简洁明确、协调一致，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

（十六）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进一步健全高校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工作机制，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作用。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推动学术事务去行政化。提高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水平，充分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术发展、学术评价等事项中的重要作用。确立科

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突出同行专家在科研评价中的主导地位。

(十七) 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积极推进高校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等校务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的情况外，均应当依法依规公开相关信息。畅通监督渠道，发挥社会公众、媒体等力量在监督中的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工作透明度，增强信息公开实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八、强化监管优化服务

(十八) 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支持高校适应创新发展需要，推进治理结构改革。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通过完善信用机制、“双随机”抽查、行政执法、督导、巡视、第三方评估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十九) 加强协调与指导。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全局意识，加强协调，相互配合，整体推进。要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防止“同质化”。对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高校给予必要政策倾斜。要及时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二十) 营造良好改革环境。各地各部门要简化优化服务流程，精简和规范办事程序，缩短办理时限，改进服务质量，让高校教学科研人员从过多过苛的要求、僵硬的考核、繁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依托“互联网+”，积极推动高校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提高办事效率。抓紧修改或废止影响高校发展和教学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不合时宜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保持改革政策协调一致。做好改革的总结推广和宣传引导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各地各部门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教情，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和高校实际，抓紧细化高校人员总量、职称、薪酬等方面改革的试点或落实办法，大力推进改革进程。各高校要及时制定实施细则，向院系放权，向研发团队和领军人物放权，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改革将往何处去？怎样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19日就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回答了记者提问。

增实力、惠民生，向教育现代化迈进

问：“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改革要实现哪些目标？

答：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推动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明确了全民终身学习机会进一步扩大、教育质量全面提升、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人才供给和高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教育体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目标。

具体来说，规划提出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进一步巩固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城乡、区域、学校之间差距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区、市）比例达到95%，建成覆盖城乡、更加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完成教育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0%等目标。

保基本、补短板，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问：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十三五”期间将如何促进教育公平？

答：一是保基本。规划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水平，“十三五”时期将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重点是要推动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扩大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扩大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范围，实现“两免一补”城乡全覆盖，让老百姓享受更加均衡和优质的义务教育。

二是补短板。新增教育资源重点向中西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和边疆地区倾斜，加快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要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针对高中阶段教育尚未普及、学前教育入学率偏低的问题，实施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提高入园机会和保教保育质量；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重点提升中西部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水平。

三是精准帮扶。规划提出保障经济困难群体平等受教育权利。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让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摆脱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面向残疾少年儿童，办好特殊教育，通过随班就读、在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为残疾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做好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工作，进一步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学和升学考试的政策措施，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健全服务体系，实行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政策。

提质量、调结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问：教育改革如何提升教育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答：规划提出，把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核心，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关键，创新育人方式作为突破口，把构筑质量保障体系作为基本保障，把教育信息化作为重要手段，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当前，教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集中反映在教育结构问题上。为此，规划明确提出了三项任务：

一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推进区域、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新的城镇化地区、产业集聚区、边境城市延伸。统筹城乡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和建设规模，消除城镇“大班额”。

二是优化教育体系结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着力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大力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加强大国工匠后备人才的培养。针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的短板，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学习制度，创造终身学习、多渠道成才的环境。

三是优化人才培养结构。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新增计划主要用于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扩大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优化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结构，加快培养现代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急需人才。

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2017年

解读“十三五”：教育改革和发展之路

编者按：今年年底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题，提出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其中，“普及高中免费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等问题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教育的老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教育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教育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本期节目中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新思考。

主持人：梦娇

嘉宾：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精彩观点：

■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公平的问题，一个是品质的问题，这一次的五中全会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十三五”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已经明确提出来，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地做好教育公平的问题。

■我说吸引民间资本，可以把大学交给像俞敏洪、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来做大学，我们不是说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大学，而是用企业家的资本和智慧去改造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你想建就能建的，它需要很多条件，它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访谈实录：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求是访谈》。这一期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来一起和我们聊聊“十三五”期间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朱老师您好！

朱永新：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关于“十三五”期间这个教育方面的议题，您最关心的是哪一个？

朱永新：“十三五”期间的教育问题当然关心问题很多，因为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公平的问题，一个是品质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五中全会应该说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十三五”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已经明确提出来，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地做好教育公平的问题。

因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一直努力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在集中我们的国家的财力往西部地区、往边远地区、往农村地区倾斜，应该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公平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得到非常好地解决。

一个就是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还是比较大，而且这个差距不会短时期内缩小，因为基数不一样，有些东部地区的城市，它的公众教育经费比西部要高出几倍，甚至于近十倍，那么大家都提高，它这种差距只会拉大。所以我觉得对西部的倾斜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同时最关键的是，要出台行之有效的办法，鼓励优秀的教师能够到农村，能够到西部，这样才能真正地保证教育品质。因为决定教育品质的最关键问题还是教师的问题，如果没有好教师真正在农村、在西部、在边远地区，要提升教育质量还是一句空话。

主持人：普及高中教育是“十三五”规划中教育方面的一个热点议题，有人认为“应该慎提高中免费教育”，您怎么看？

朱永新：五中全会建议稿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要普及高中教育，应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普及不是免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陆续地已经出台或者准备出台想在高中阶段也进行免费教育，那我觉得这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由于中国还是一个，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是很低的，尤其是我们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如果普及高中教育，那么我们有限的教育经费到底往哪里去投？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可以对弱势群体实施免费教育。对边远地区的、农村地区的孩子实施高中的免费教育，但是对大部分的城市地区来说，没有必要，至少从目前的财力来说还不可能进行高中免费教育。

如果说免费的话，我个人倒是倾向于“往下延”。我曾经提过建议，从投入产出比来说，从教育自身的内生规律来说，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来说，实际上人的早期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更大，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是人的很多心理的特征、很多能力，都是在早期的教育中形成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加强了，我觉得它具有更加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曾经提出过，能不能免费教育往下，从小学往下延伸，那么这样就是在“十三五”期间，尽可能全面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三年教育，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任务。

主持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不能‘自拉自唱’。”那么，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呢？

朱永新：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你想建就能建的，它需要很多条件，它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这个系统性的工程我觉得，前面我实际上我已经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大学的门槛太高，没有人愿意来投资大学，也没有人愿意真正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所以我说要有两个东西进大学，第一就是资本进大学。中国的老百姓手里那么多钱，中国的企业家手里那么多钱，大家把钱都投入到股市上去了，都想通过钱生钱，那我们能不能吸引一些民间资本到大学来。比如说你投到大学的钱全部给你免费，比如说你投到大学的钱政府给你配套，给你匹配性支持，这样就是鼓励民间资本把钱送到大学里来。

我说吸引民间资本，可以把大学交给像俞敏洪、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来做大学，我们不是说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大学，而是用企业家的资本和智慧去改造大学。因为现在大学门槛很高，真正的民间资本进不来，因为它要从专科开始办起，有多少年才能办本科，本科多少年才能办硕士，然后对教育面积要有 500 亩土地，等等这些门槛都高了以后，就是很多人望而生畏，进来的风险太大。但是如果把现成的大学交给他们，我说你能不能拿一所外国语大学交给俞敏洪，让他办一个，好好地办一所外国语大学，你能不能拿一所大学交给马云，让他去好好办一所商学院，如果他们来做，也许能够会有很大的突破，也许可以叫板和挑战我们现在的学校。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这样学校没有一些“鲶鱼效应”，现有的学校也很难真正地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那么也很难真正地有学校对他们提出挑战。

第二，民间的智慧要进来，就是办大学和办企业一样，它也需要智慧的，真正的社会精英如果不进入大学，大学也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国家民国时代，那些最优秀的社会精英基本上集中在学校里，在教育领域里，在大学。大学是一个自由思想产生的舞台，大学是一个学术创新的重要基地，如果没有一流的人才进来，没有一流的思想进来，没有一流的智慧进来，你大学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因为大学它要求很多的原创性，大学它要求能够对社会贡献它

的智慧，为国家的科学决策能够提供支持，它应该成为很重要的智库、思想库。大学它应该成为一个新技术的策源地，新的技术、新的知识应该在这里产生，所以这些产生的基础就是人才，没有人一切都是空的。

我前不久我到了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研究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我们知道冯骥才先生是，也是我们民进中央的原副主席，同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是个非常著名的画家，也是个非常著名的民间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专家，那么这些年来他在天津大学专门成立了冯骥才艺术研究院。我到这个研究院去，这个研究院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冯骥才先生把他多年的收藏放在这个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也是一个大型的图书馆，是一个民俗资料馆，所以他在这里汇聚了全国的一些优秀的专家资源，定期在这里讲学、交流、碰撞，他甚至邀请了国外的专家多次在这里参加举行学术研讨会。那么这样就是他就有一个属于他的道场，有一个属于他的一个舞台。那么像中国这样的专家游离于大学之外的太多太多，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到大学来，交给他一个学院，交给他一个舞台，那么这样来说，所以你像他这个学院成立时间不是很长，他承担了三项大的国家工程，那么我觉得实际上冯骥才的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我们完全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的一流的，甚至于世界一流的专家。

另外就是我们的大学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学总体上说行政化的色彩还是很严重，尽管我们不断地呼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身你大学有那么多级别，有所谓副部级的大学，有正厅级的大学，大学本身就三六九等，那么这样就把大学的领导人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在对待，在组织部门在任命，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世界大学的统领，世界大学的统领还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去选那些真正有教育理想，真正懂得教育规律的优秀教育家，那么更多地发挥教授自治的作用，发挥学术力量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学的教学方式。因为你建世界一流大学，你整个的研究方式、教学方式的变革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学基本上它的教育方式跟中小学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还是按部就班上课，我经常讲上课记笔记，考试去背那个笔记，然后考过以后就全忘记那个笔记。所以这样一来，它就很难真正地激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主持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如何用这五大理念去引领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的发展？

朱永新：从创新发展也好，绿色发展也好，协调发展也好，开放发展也好，共享发展也好，我觉得对教育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创新来说，因为创新是也可以算是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那么怎么样通过创新发展去推进教育的创新和创新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那么从绿色的发展来说，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绿色发展的理念去推进中国的生命教育和生态教育，加强我们学生的环境意识和自然保护的意识，怎么样通过协调发展，去推进我们的教育公平。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整个教育的不协调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是比较大。那么怎么样通过开放发展去进一步推进教育的开放，去推进教育的国际化，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和民间智慧进入到我们的教育领域，加强和国际教育的合作，怎么样通过共享发展，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教育带来的这样一种恩惠，让弱势的人群同样也能够享受均等的教育，所以怎么样更好地让“五大理念”在我们“十三五”的期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好的落实，我觉得这也是需要特别教育关注的。

《求是》访谈 2017年第69期

“十三·五”期间东西部人才流动政策引导 王庆环

解决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失问题，“不鼓励”的政策导向下，就需各方用“情”来促成情况向好。一是东部高校对中西部高校人才的“手下留情”。二是中西部高校对自身人才要用真情。

在日前举行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一句“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引起了公众的热议。

其实，类似的话以前也有人说过，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校长，但此番被教育部部长说出来，大家觉得情况有些严重，于是网络上的议论也就多了起来。有人觉得市场经济都这么多年了，人才市场也早就遵循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一句“手下留情”，就会管用吗？还有人觉得教育部要用行政手段限制中西部人才向东部流动，认为人才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发现和发挥其价值，限制人才流动有违公平，降低效率。还有人担心，中西部高校今后招到人才会更困难，因为人才怕一去了中西部就给“锁”在那里动不了了。

作为教育部长，陈宝生出于对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失的忧虑，用一句拜托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网上因此而生的议论，站在人才个体角度上进行利益表达，也不是没有道理。笔者以为，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出现的困境，应该用一个“情”字来突破。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政策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今年1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指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用的是“不鼓励”一词。这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提出“十三五”期间“支持东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向西部地区流动，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用的仍是“不鼓励”一词。“不鼓励”蕴含了不用行政手段的苦心，是值得肯定的。

解决西部高校人才流失问题，“不鼓励”的政策导向下，就需各方用“情”来促成情况向好。

一是东部高校对中西部高校人才的“手下留情”。其实，自2001年教育部启动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该计划已由起步的1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支援13所西部高校，发展到现在的100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参加支援、75所中西部高校接受支援。随着“十三五”期间这一政策的加大力度执行，东西部高校将成为发展共同体，东部高校要对中西部高校“输血”而不是“抽血”。

二是中西部高校对自身人才要用真情。对于很多优秀人才来说，薪酬未必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中西部各地各高校要努力提供干事的平台，做事的环境，用情呵护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如此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凡事合情合理才能达到高境界。从“理”上讲，很少有人不明白中西部高校的发展对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对于中西部地区能否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意义，如果大家再多用一些“情”，包括东部、中西部、各级政府还有人才本身都对中西部高校多用一些“情”，那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就会有希望。

《光明日报》2017.03.01.

委员张明华：以高水平大学支撑新兴城市创新发展

肖冰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宁波民建主委、宁波市副市长张明华今年两会期间在北京指出，东南沿海一批新兴城市或区域至今没有高水平大学布局，已成为制约城市经济社会持续提升发展的重要瓶颈。

张明华指出，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中，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一直是优质高教资源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集聚区，原先确认的39所“985工程院校”、112所“211工程”院校，主要布局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南京、广州、天津、成都等历史上形成的中心城市或相应的省会城市。以宁波为例，他指出，中国东南沿海涌现出一批经济发展快、综合实力强、人口和产业密集的新兴城市或区域。其高教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没有高水平大学布局。

张明华说，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城市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大学的支撑。而目前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不对称布局，远远不能满足沿海新兴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城市普遍面临转型提升，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高端城市化、区域都市化，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与城市能级、功能提升发展相互支撑、相互引领。”基于此，张明华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在发展理念上，将新增优质高教资源向新型城市化地区、产业集聚区延伸、倾斜，支持在确有需求、确有条件的地区新设立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举办高水平大学(校区)。

第二，在战略规划上，建议教育部参照“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做法，对于迄今尚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且地方政府对发展高水平大学积极性高的副省级城市，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支持其建设1所地方高水平大学，提升高教发展能级、层次和水平，使其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和人才高地。

第三，在机制创新上，深化民办高等学校体制改革，加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对非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给予政策倾斜，进一步调动和发挥社会办学积极性，多元渠道筹集资金，积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并对社会力量参与举办高等教育予以切实支持。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7.3.13.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田慧生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创新育人模式，更新育人理念，创新育人方式，全面提升育人水平，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必须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一要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必须以坚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为前提。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所在，是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行动，也是适应教育内涵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更需要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与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探索更加有效、适合的培养方法、途径和机制。

二要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更加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建立大中小学之间人才培养沟通机制，鼓励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围绕人才培养开展合作；搭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沟通的桥梁，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校之间、学校与经过认证的培训机构之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机制，打通升学壁垒。在国家基本学制下，允许各地试验不同形式的分段培养制度。

三要形成有利于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顺应时代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紧紧围绕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及培养要求，构建完善的课程教材体系，深入研究、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满足文化传承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坚持因材施教，注重学思结合，引导知行统一，创新教学方法，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改革，推广启发、讨论、参与的教学方式，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根据不同阶段培养目标建立多元化学生评价标准，推广学生成长记录、发展性评价等多种形式的学生评价方式，完善学生评价体系。

四要完善优异学生选拔和培养机制。对成绩优异的学生跳级、转学、提前毕业、选修高学段课程、转换专业等制定特殊支持政策；建立中小学与大学、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企业与企业在优异学生培养方面的合作机制，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国别的教学与研究；鼓励高等学校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大对学生创新活动的支持和资助力度。

五要建立开放多元的评价体系。改革宏观层面的人才评价和选人用人制度，引导社会用人克服单纯追求学历的导向，为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环境；鼓励学校根据实际制定多样化教学评价标准，支持学校自主开展教育质量评价和教学诊断活动，同时培育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教育认证机构和评价机制，参与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以及教学诊断活动的指导。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是一个复杂的、专业的、系统的工程，需要有针对性的、持续的专业支持和指导，要发挥教育科研的智库作用，凝聚专业团队进行长期专门研究。人才培养方式创新和改革必须依赖于在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的经验积累，要鼓励各地开展区域教育实验，允许试点先行，鼓励各校大胆突破，在课程设置、内容选择、教学组织形式、课堂形态和考试评价等方面进行前瞻性探索和试验。此外，还要加强宣传引导，使全社会都能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人才成长观念，彻底转变唯学历的选人用人观念，转变唯分数、唯智育的教育教学观念，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教育报》2017.02.04.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辛涛

教育评价是引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期间，随着教育发展和改革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但我们仍看到，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着影响和制约教育深化改革与发展的诸多问题。《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改进各级各类教育评价体系，是提高教育质量、营造良好育人生态的重要内容。

第一，要以育人为本，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作用。教育评价对教育教学具有导向作用，良好的评价体系能够促进教学和学生成长，而不良的评价体系可能扰乱教学规律，对教学和学习产生不利影响。以育人为本的评价理念，就是要全面分析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样的根本问题，将党和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各方面要求纳入评价体系，构建促进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学生发展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

第二，整合基础教育评价领域政策制度，系统设计评价体系。当前基础教育领域的评价改革稳步推进，取得诸多进展。考试和招生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深化，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顺利进行，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进入高中课程标准，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扎实有效，但仍要看到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仍需要进一步优化。优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和结构是实现教育评价促进科学育人导向的前提。一是理顺基础教育领域的评价各项政策和制度内在关系，使评价体系内部有效衔接。建立科学教育评价体系，首要任务是理顺不同教育评价之间的关系，去除不合理和不必要的评价，合并功能重叠的评价，使教育各个环节的考试与评价能够有效衔接，促进教育评价高效发挥作用。二是系统化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

第三，构建科学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使教育评价成为撬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杠杆。随着教育领域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国家在职业教育当中的投入不断加大，职业教育质量在稳步提升，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专业人才。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单依靠国家重视和加大投入已经不能使得职业教育质量大幅跃升，需要调整教育内容，以规范化的教育评价制度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要根据职业教育特点规律，建立以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的职业教育评价内容标准。职业教育面向社会、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培养人才，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与实施应不限于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畅通企业、用人单位等多种评价渠道，促进职业教育多样化有特色发展，以评价为杠杆提升整个职业教育质量，为我国跻身世界强国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

第四，规范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以标准促进高教评价体系的优化和完善。当前，人才培养应该被高校摆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从评价标准上看，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十三五”期间即将颁布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鼓励行业部门制定人才评价标准，这些重要的质量标准将成为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参照。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要按照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大学生的目标要求，考察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文化

知识、创新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重点放在当前社会和未来发展急需而大学生群体紧缺的素养要求上来。从评价方式上看，高等教育评价既要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符合国家统一要求，还要促进高校教育自主性，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基于此，教育部门对高校教学质量审核评估的同时，高校也要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自评体系；政府也要推动和支持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校教育评价，形成对高等学校育人评价的合力。

《中国教育报》 2017.02.04.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

高靓

“保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长，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达到2人，在学研究生总规模达到290万人。专业学位硕士招生占比达到60%左右。”今天，由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勾勒出到2020年以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路线图。

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要继续坚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把寓教于研、激励创新作为根本要求，把分类改革、机制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学位授予质量，加快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

为实现目标，规划提出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六大任务，包括：主动适应需求，动态调整优化结构；改革培养模式，提升创新和实践能力；健全质量评价，完善监督保障体系；扩大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升研究生教育整体实力；拓展育人途径，推动培养单位体制机制创新。

规划提出，要稳步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同时，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机制。探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应用型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办法，拓展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

“十三五”期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健全学科预警机制，健全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常态化与授权点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完善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制度，构建优势资源和有利因素互补相融的协同培养机制等，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规划还提出，要形成各方合力支持的投入保障机制，强化导师培养责任和能力，构建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并将组织实施“一流研究生教育建设计划”“未来科学家计划”“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计划”“课程体系及案例库建设”“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

《中国教育报》2017.01.21.

以分类管理推进高校科学定位和特色发展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马陆亭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将实现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跨越，多样化需求和特征更加明显，高校的合理定位因此成为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需要加快实施分类管理工作。《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教育的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展主线，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这是推动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的重要措施。

高校分类管理之所以势在必行，一是因为我国经济形态多样，产业差异很大，地域色彩多元，战略重点各不相同，各行各业各地对教育的要求很不一样；二是因为大学已走出象牙塔，高等教育已融入社会且体量很大，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在不断增加，趋同的高校模式已不能适应多元的社会需

求。此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对教育结构和质量的要求将会更高，高等教育正转向内涵式发展，多重转型的叠加将进一步考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因此，高校分类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落脚点在人才培养上；而为了满足人才的多样化，各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就不能一样，就需要实现各自的科学定位和特色发展；进一步说，就需要有方向引导的不同和管理政策的差异，高校设置标准和评价内容不能单一，即所谓的分类管理。这就是事物的逻辑。

高校分类管理涉及分类设置、拨款、指导、评估等多项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以保障和推动不同的高校走自己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即所谓的合理定位和特色发展。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面向创新高原，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办学定位转向培养应用型和技术技能人才，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因此，二者鲜明地针对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顶天立地”问题及社会对高端与一线人才和成果的迫切需求，是从国家的角度对高校不同发展目标和办学模式的推动。

任何高等学校，都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等基本职能，但这些职能在每所高校的搭配和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即各自使命不同，这就是定位和特色。一流大学，需要在知识创新上居领先地位，因此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评估拨款需要围绕着创新驱动来进行，需要不断产生新知识和培养能创造新知识的人；而转型高校，重点关注知识的应用，因此需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育人，侧重于把新的科研成果推广到企业或把企业先进技术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共同点也有，比如都要关注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要进行理论教学、实习实验、社会实践等。

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对创新驱动的带动作用，加强省级政府对区域内高等学校的分类设置和管理，增强中心城市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功能，引导教师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在政策实施上，需要支持省级政府根据国家建设布局，结合自身条件和需求，自主推动区域内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加强对转型发展高校试点工作的统筹指导，加强对中心城市高等学校体系建设的科学指导，注重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新城化地区、产业聚集区和边境城市延伸，同时国家还要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特色发展。

我们需要增加政策的弹性，给不同高校群落以相应政策支持，健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建设标准，使得学科型与应用型、综合性与行业性、巨型大学和小型学院等不同学校均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推动高等学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因地制宜探讨自己的专业培养方案，构建相对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中国教育报》2017.02.04.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为此，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意见》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1、出台《意见》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意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激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创新人才，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因此，出台《意见》非常必要：

一是中央的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强调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2016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大学召开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文件。2016年5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提出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这些都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体制、现代大学制度、办学体制、推进管办评分离等多方面改革取得很大进展。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在当前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切实增强科研创新能力、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变得尤为迫切。

三是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必然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明确高校办学主体地位、落实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中，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通过“放管服”的综合性改革，切实落实《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活力。

2、《意见》有哪些主要特点？

从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从研究起草到五部门联合发布，用了一年的时间。总结《意见》制定的过程和情况，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高度吻合。新闻媒体以“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更大活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简除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等为标题，对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进行集中报道，引起了高等领域广泛的拥护和高度的认同，希望尽快出台放管服文件，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为教学和科研减负松绑，激发活力、创造动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二是对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具有高度共识。此次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涉及到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薪酬、经费、资产管理等诸多方面。各相关部门多次研究沟通和协调相关改革思路与举措，《意见》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20次会议审议。各部门对深化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均表示理解与支持。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意见》经国务院同意后印发。

三是与有关改革文件有机衔接。《意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中央层面已经出台的新文件的协调关系，处理好与地方已经先行推进的改革举措的关系，处理好创新改革与现行体制、管理方式的过渡衔接关系。关于科研、采购、外事等方面，近期已经发布实施的法律和政策文件已经作出明确规定，《意见》调整了内容定位，不再重复规定。

四是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和亮点多。《意见》既有突破性的改革，也有现行政策的完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为改革现行编制管理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改革通道；明确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标志着完全取消了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意见》还对学科专业、进人用人、薪酬、经费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做了规定。

3、学位授受审核改革的主要举措有哪些？

自1981年《学位条例》实施以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组织了多次学位授权审核，基本建立了覆盖各地区、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的学位授权体系。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已成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线，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需要进一步深化学位授权审核改革。

一是突出质量标准主导作用，进一步细化学位授权审核各类申请基本条件，加强申请条件与研究生培养的衔接，严格按照申请条件依法依规实施授权审核。对一些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省级学位委员会的授权审核职责。强化省级统筹，明确由省级学位委员会规

划本区域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的发展和建设，确定发展重点，审批本地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授权专业，组织实施本地区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和博士学位授权初审。

三是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放权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校自主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评审，探索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学位点。四是强化学位授权审核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资源配置、培养质量和学位授权点评估的有效衔接，加强授权审核工作的过程管理。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

4、本专科专业设置“放管服”体现在哪些方面？

近年来，教育部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努力构建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筹、高校依法自主设置专业的管理机制，提高高等教育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是建设了普通高校专业目录体系。2012年修订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本科专业目录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加到12个，新增了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原来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由原来的635个调整为506个；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分为“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2012-2016年，新增82个本科专业进入目录。2015年修订完成《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每年增补一次，2016年首次发布了增补的13个专业。

二是落实和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支持高校依法自主设置专业，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和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以外，高校自主设置专业，实行备案制，专业设置备案每年集中进行一次。除医学、教育、公安和司法四类国家控制的高职（专科）专业外，原则上不再新增国控专业，高校可根据专业培养实际自行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方向。

三是加强省级本科专业管理统筹权。要求高校主管部门综合应用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等措施，促进所属高校加强专业内涵建设。2016年授权上海市在“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框架下，开展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设置省级审批试点。

四是引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从2012年起连续发布全国和各地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引导专业设置。2016年重点支持高校设置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格鲁吉亚语、儿科学等战略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医学类紧缺本科专业；同时引导高校对1600多个不适应办学定位和特色发展的本科专业进行了调整。

五是优化专业设置服务。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规定了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作为高校设置专业的参考标准。组织相关学科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了92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即将对外颁布，将作为高校专业设置、专业建设和专业评估的重要依据。组织有关专家组织陆续研究发布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为高职专业设置提供指导。开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管理平台”，提高专业设置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工作效率。

5、高校编制、人事和薪酬等方面有哪些改革？

教育部所属高校现行编制规模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编制管理部门核定。高等教育事业根据国家需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后，高校编制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发展需求。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对符合条件的公益二类单位逐步实行备案制管理”要求，按照《意见》规定，将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根据生师比、办学层次、高校特点和事业发展需要等研究制定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适时选择不同层次类型、工作基础好、日常管理规范的高校开展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关于高校人事管理，岗位设置方面，教育部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岗位总量、结构比例、最高岗位级别确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收入分配方面，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权、主要负责人绩效工资核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人员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所属高校根据教学、科研、管理等需要，依法依规自主开展相关工作，教育部做好监督检查等工作，不干预管理过程。同时，教育部切实注重做好对所属高校的监督管理。近几年，印发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直属高校、直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薪酬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等文件。并通过定期巡视、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年度统计、专项调查等，监督所属高校执行国家政策、内部人事管理等情况，对存在问题单位从严

要求做好整改。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所属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有关文件，进一步健全制度、强化监管、规范管理。地方高校的编制、人事和薪酬等方面由地方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具体管理，有的地方高校反映在用人自主权方面所受影响较多。下一步，教育部将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继续推动落实和扩大高校人事管理自主权。切实做好根据高校发展需要实施调整编制、岗位总量，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向高层次人才集中单位倾斜等工作。

6、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改革点在什么地方？

《意见》提出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主要包括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审批权和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改革前，根据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高校副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分放到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多数省份逐步将评审权下放到高校，由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取消了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高校可以自主评审副教授。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人事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工作的通知》（教人〔1994〕19号）和2004年《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412号），高校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实施。具备评审权的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在评审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存在对师德、教学业绩考核重视不够，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尚未完全建立。

根据《意见》实施改革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教育、人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在评审方法方面，强调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7、《意见》关于完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的规定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意见》专门有一部分规定了“完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主要解决四方面问题：

一是解决高校经费安排自主权、统筹使用权问题。通过完善预算拨款制度，优化拨款结构，来加大基本支出保障力度；针对基本支出占比较低的地方，要求进一步优化结构，合理安排基本支出，以扩大高校经费安排自主权。通过尽快完善资金管理办法、采取额度管理、自主调整等措施，由高校在批准的预算额度内、在不改变项目资金用途的前提下，自主统筹使用项目资金，切实扩大高校项目经费使用统筹权。

二是解决高校经费资金支付效率偏低问题。针对高校经费管理特色，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划分，逐步扩大财政授权支付范围，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简化用款计划编报内容，逐步实现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项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报用款计划，切实减轻高校工作量。

三是解决高校资产处置及处置收益使用权问题。一方面，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适当提高资产处置的备案和报批标准；另一方面，学校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应淘汰报废的资产，处置收益由上缴国库调整为留归学校使用，以调动高校的积极性。

四是解决高校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问题。由税务部门执行好各项涉及高校的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意见》对加强经费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高校要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完善内控机制，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按照规定管好用好各项经费和资产。二是强化高校在资产管理方面的主体责任，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高校应依法接受审计监督。

8、《意见》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和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做出什么规定？

为全面深化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意见》分别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和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做出专门规定。关于内部治理，《办法》要求：一是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从校级、院系级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精神。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从教育法律规定

的基本制度、高校章程、纪律及校内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全面要求，促进高校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三是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健全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提高学术委员会建设水平。四是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依法推进校务公开，畅通监督渠道。

关于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办法》要求：一是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转变管理方式，通过信用机制、抽查、督导、巡视等加强监管。二是加强协调与指导，各地各部门要互相配合、整体推进，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三是营造良好改革环境，简化优化服务流程，精简和规范办事程序，推动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改进服务质量。

9、如何贯彻落实《意见》？

一是学习好宣传好。教育部等五部门将通过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对《意见》进行学习宣传和推动落实。通过各项落实改革举措的工作会议加强对政策的解读。推动各地各高校学习掌握《意见》的精神与实质。

二是贯彻好落实好。教育部将落实好学科专业、职称评审、完善校内治理等方面的改革事项；积极主动配合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牵头部门尽快制订出台配套文件，抓紧细化高校人员总量、职称、薪酬等方面的试点或落实办法。鼓励地方结合当地实际改革创新。

三是做好分工协作。“放管服”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工作，涉及到各有关部门各有关方面，既要做好分工、明确责任，也需互相合作、密切配合，既要明确改革的短期目标，也要做好改革的长期准备。教育部将和编制、财政、人社等部门做好综合改革的统筹规划和任务落实等工作。

教育部网站 2017.04.07.

教育部等五部门放大招：高校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到高校 沙璐

教育部等五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

鼓励高校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

《意见》要求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提出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制订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开展试点。试点高校人员总量实行动态调整。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

《意见》还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

教育部所属高校现行编制规模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编制管理部门核定。高等教育事业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后，高校编制严重不足。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教育部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岗位总量、结构比例、最高岗位级别确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

在收入分配方面，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权、主要负责人绩效工资核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

《意见》支持高校推进内部薪酬分配改革，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

教授副教授评审权下放到高校

《意见》明确，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

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举意味着完全取消了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今年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工作要点》中就提出，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

改革前，根据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高校副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实施。

该负责人介绍，多数省份逐步将评审权下放到高校，由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

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高校可以自主评审副教授。

《新京报快讯》2017.04.06.

破解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黄德宽

近年来，我国高校区域布局 and 综合发展水平，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依然凸显。全国2850多所高校中，教育部非直属院校约占96%左右，地方院校居多。地方院校不仅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而且也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主体和基础。但整体看来，地方高校办学水平依然较低，支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高校，优质教育资源较为缺乏，经费投入依然不足，人才流失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导致地方高校和部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和经济发达地区高校间实际办学水平。

第一，国家应调整和优化我国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校发展规划和政策，将全面提升地方高校办学水平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作为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回应这些地区人民期盼享有优质高等教育的重大民生工程，国家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还应指导和支持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实际，建设本地区的国内一流高校和特色学科。对纳入“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地方高校和学科，中央财政要加大经费转移支付比例，政策上予以重点支持和倾斜。

第二，将中西部地方“211工程”高校纳入“双一流”建设计划，加大重点支持和扶持力度，确保这些高校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将这些高校纳入“双一流”建设计划，对中西部高校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是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失衡，优化教育结构布局，见效快、效益好的可行举措。

第三，按照《实施办法》，“坚持公正公平、开放竞争”，重点支持一批地方高校特色和优势学科建设。结合“双一流”建设计划，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十二五”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并根据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按照“双一流”建设“扶优、扶需、扶特、扶新”的政策，引导地方和中西部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有针对性地为地方院校提供政策和条件支持，如增加博士生招生名额，加大人才扶持力度，增设一批新的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重点研究基地等，以形成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发展平台，为地方高校发展全面创造条件。

第四，国家在遴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时，关于认定标准，既要体现“世界标准”，更要坚持“中国特色”。依据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使命和发展目标，坚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要避免认定标准的单一化和简单化，制定适宜于不同类型高校、不同门类学科的分层分类标准，坚持分类指导、兼顾公平的认定原则和评价体系，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不同门类的学科，都能获得公平发

展的机会，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行业部门和各类院校的办学积极性。

第五，为真正体现和落实分类评价和分类指导的精神，在聘请“双一流”认定专家时，在坚持条件和水平要求的前提下，要注意专家的代表性。聘请一定比例的高水平地方和行业院校的专家，以保证相关评价原则和分类评价标准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评价活动中。

中国教育部官方网 2017.04.11.

清华北大智库专家做客光明网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发展的贡献

11月5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光明网理论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光明网理论专家委员会委员姚洋做客光明网，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胡鞍钢表示，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带有超越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普通老百姓也能听明白。五大发展理念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融通、相互促进，有着统一的目标。“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建议》中“发展”出现200多次，位居高频词汇榜首，几乎是其他热词出现次数的总和。对此，姚洋表示，这充分凸显了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其他各项工作。

在胡鞍钢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发动三大战役：第一大战役是向极端贫困宣战，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第二大战役是向污染宣战，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彻底脱钩；第三大战役是创新战役，为中国长期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建议》提到，创新是引领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怎么去落实创新？姚洋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依赖市场，相信企业家能找到市场的点。政府要做好制度设计，做一些看准的项目，孵化一些好的项目。他举例说，现在高校有很多搁置的技术，要建立机制将它们转化出来。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的难点在哪？胡鞍钢强调，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上网，让人民监督，让社会监督。五年规划本质上是关于人民的规划，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公开透明。姚洋则对时下火热的“互联网+”保持清醒的认识。他表示，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挑战，实业界的互联网焦虑也随之而来。怎么办？姚洋指出，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国家层面还要强调实业，要强调制造业发展。“互联网毕竟只是个手段，最后还要以制造业为基础，制造业不搞好什么都别谈。”姚洋强调。

“十三五”规划举世瞩目，但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读。姚洋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外的很多人对中国体制认识不清，“他们没有搞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位置，老在自己的框架里，用西式民主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姚洋表示，希望我们能用地道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中国做了什么。

《光明日报》2015.11.06.

转向应用型，地方本科需要突破

练玉春

2014年6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随后，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6部委颁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在办好现有专科层次高等职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发展应用技术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两年多过去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展得怎么样？本报日前在上海组织《实践与探索：地方本科院校转向应用型》专题座谈会，邀请全国5省市9所相关院校负责人聚谈实践中的转型，转型中的思考。今天刊发此文，希望推动相关工作。

1、转型方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带来新要求

主持人：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极为重要的构成，也是支撑和保障我国各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人才来源。进一步办好地方本科院校意义重大。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来说，如何转型发展，已然成为必须作答的大课题。

严欣平（重庆科技学院校长）：高校的发展应该符合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企业的技术岗位必然需要“本科人”来进一步推动发展。因此，不仅是地方本科院校，更多的高等院校都该有向应用型转变的意识，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后期的必然诉求，是高等教育向普及化转型的必然趋势。

重庆科技学院2004年升本，我们的出身就是工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坚守四点：一、行业性；二、地方性；三、开放性；四、应用型。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瞄准重庆发展需求，细化强化与重庆地区企业之间的联系，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相结合。这不但使得我们的科研经费大幅度提升，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参与到重要的项目建设中，最终，学校和师生都受益匪浅。

李江（上海工程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上海近年确定了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战略。上海市对高校进行了新的分类，希望每一所高校都办出自己的特色。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积极对接这一战略，进一步明确了创建“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的办学定位。

而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与行业协同育人、协同办学、协同创新的“三协同培养模式”，学生比较受企业欢迎。上海航空最多的时候1/4的员工是我们学校的，上海申通地铁有1/6的员工来自我们学校。

夏建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的世界级现象。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等都曾经掀起举办“技术大学”的高潮。上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需要本科层次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呼唤更多的应用技术大学。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就是回应这种呼唤。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产业而生，因产业而长。这里的“产业”指的就是上海地方经济，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就带动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发展。

2、转型机遇：重要的是自我定位

主持人：刚才几位校领导提到地方本科院校转向应用技术型，直接服务地方带动了学校发展，夏建国校长还提到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高校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大家的意见如何？

陈建国（许昌学院党委书记）：转向应用型，其实也是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机遇，应该自觉地牢牢抓住。

许昌学院1942年建校，2002年升为本科，是河南省首批试点转型发展的地方本科。学校这几

年立足于“服务型、现代型、应用型”的定位，深化校企合作，发展快速，获得发明专利 20 项、成果转化 5 项。目前，学校的理工专业在校生过半，去年就业率达到 96%。

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坚持“立地”，服务于地方发展，虽然是省属院校，学院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许昌市每年给学校 1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学校匹配 1000 万元，成立了 9 个协同创新中心，打通“学科、专业、产业”三者之间的联系，建设 5~8 个专业集群，加强“产教融合”。

耿红琴（黄淮学院副校长）：转型是趋势，也是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高校的自我定位。

有的院校对于转向应用型有顾虑，认为与职业教育拉上了关系会降低自己的层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还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对职业教育有误解。而面对地方发展、国家战略，绝大多数地方院校是清醒的，是愿意改变的，但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这些年，黄淮学院在专业改造方面，可以说是壮士断腕，该改造的就改造，该砍掉的就砍掉。目前，我们 80% 以上的专业和地方产业相结合，立足于服务地方。一所大学的转型发展，需要全校师生齐心协力。需要校长的办学理念、副校长的执行力、中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其次，也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让地方高校独扛转型发展、人才培养的大旗，是不客观的。

金则新（浙江台州学院校长）：我们学校是 2002 年升本，定位就是“有影响有特色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

社会还是非常需要应用型的高校，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社会需求的发展，是产业转型的时代要求；其次，许多企业、产业、研发中心，需要与我们密切合作、与地方紧密合作。这给了地方本科高校发展的机会。

企业的需求是什么？高校如何满足？这是我们这类高校应该思考的问题；如果建立应用技术型大学的统一标准，规范政策导向、完善评估体系、建立考核指标，给地方本科高校正规化建设、提升质量的机会。那么，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专业硕士、应用型博士等高层次的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更应是地方本科的机会。

3、转型探索：转的是办学类型

主持人：转向应用型，是很大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解决发展问题、生存问题的方向，这考验着这一类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智慧和责任心。

庆承松（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安徽的高校转型还是比较早的，大概十六七所学校是在 2000 年、2002 年、2004 年进行转型，都与当地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相吻合。我们这一类院校都有一个共同的定位：地方性应用型大学——直接服务地方发展。

滁州学院原来是滁州师范，是师专升本的学校，如何转型办好“多科性的应用型大学”，是校级领导着重思考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发展理念，那就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岗位的需要，建立一个产学教育融合的学生培养模式，建立一套与“职业教育体系”相对应的“教学管理体系”。因此，学院在专业设置上，立足于工科专业，以工管为主；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走“产学研”的特色路，进行校企合作；在课程设置上，“以能力为本”，在教学时着重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王亚利（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不同学校承担不同的使命和任务。研究型大学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应用型大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在转型过程中，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院校不要左右摇摆。要知道一点：转型的是学校的办学类型，不是办学层次，要敢于走适合自己院校的改革道路。

川大锦城学院 2006 年成立，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几点重要的经验：定位准，解决转型的方向问题；思路清，解决转型的道路问题；目标明确，解决转型的动力问题；措施实，解决转型的保障问题；加强产教融合，积极建立“双师型”的教师队伍，立足培养应用型人才。

4、转型突破：政策支撑与政府支持

主持人：毫无疑问，转型的“号令”正在激励着全国数百所地方本科院校撸起袖子加油干。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困难、困惑。

庆承松：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争论：转向应用技术型的地方本科，仍然是普通本科高校，还是与高职院校一样归入到职业教育系统？这背后透露出的，是因为职业教育“含金量”不够高，本科院校对转型后生源会否受影响的担忧。这就需要国家层面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完善“顶层设计”；其次，落实具体的转型指导意见。此外，应用型大学应该在适当时候，增加专业硕士点的申报，与其他老本科院校区别开来。

陈建国：应当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的支持；学校一定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培养高质量的合格本科生为己任，立德树人；同时加强产学研合作，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在起步阶段，只有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才能打通“企业需求”与“院校需求”；学校应该大胆地在建设应用型本科的过程中，突出区域特色和历史特色；而且，学校要有“定力”，不要盲目跟风，而是要立足实际，争创一流。

耿红琴：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第一，师资队伍是转型的瓶颈。由于应用型教师的紧缺，无论是课程的建设，还是相关资源的开发，都与应用型大学的诉求不相符；第二，高校转型发展的理论研究需要加强。要完善理论研究，从理论、实践上对地方高校进行引领，促进其发展方向的正确性；第三，学校外部的办学经费的不足。

我建议：第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第二，扩大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改革和完善办学经费的保障体制；第四，优化产教融合的外部环境。我们现在的导向政策还远远落后于国内应用技术大学对产教融合的需求，因此应该区分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职能，构建完善的应用型本科的建设和评价体系。

严欣平：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形成正确的舆论方向。应用型本科的定位，应该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效率转变，解决人才培养与经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其次，加快制度建设。这不是对已有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深层次的综合改合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原则，“破”与“立”并举，允许高校积极主动探索。

《光明日报》2017.02.23.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何犹豫不决

李玉兰 练玉春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学院、海口经济学院 3 所本科高校不久前同日宣布：试点整体转向应用型。另据了解，四川省日前也宣布，到 2020 年将建成 15 所普通本科转型发展示范院校。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并明确转型地方院校“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政策出台两年有余，记者调查发现，与当时的轰动效应相比，目前各地本科院校的转型步伐并没有预期中的大。安徽省教育厅原负责人就曾感慨：“我们这几年的转型，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更多的是有形的转型，侧重于身躯的转型。在新的形势下，要高度重视灵魂的转变，从侧重物理变化，到灵魂深处的化学反应。”

转型不可回避

201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地方高校转型目标。2014

年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传出消息，“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向应用型”。

经历了两年多的艰难抉择和试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科院校负责人坦言，虽然地方本科办学因生源质量下滑、毕业生就业难、专业同质化突出等问题而亟待转型发展，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普遍认为，本科院校比职业院校要高一个层次，因此“转向应用技术型”“本科职业教育”的提法，让许多高校无法痛下决心。而舆论用“降格”这样的字眼概括“转型”，也给转型院校带来巨大压力。

其实，早在政策出台之际，就有教育部官员指出，转型发展的目的就在于推动地方本科院校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既避免地方院校办学同质化问题，又更深入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伴随产业发展，各地用人单位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经越来越紧迫。

“降格”顾虑普遍存在

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全国本科高校共有1145所，其中1999年以来“专升本”新建高校有646所，约占全国本科高校总数的56.42%。这批高校虽然不乏优质资源，但总体上，上不如名校办学力量雄厚，下不如职业教育“接地气”，是必须转型的“夹心层”。

按照最初的设计，转型后的应用型高校“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既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职、高职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成为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但是，在理想与现实间，各地各校的迟疑让转型显得风声大、雨点小。

黄山学院院长汪建利道出了个中原因：“最大的顾虑还是担心变成了高职，学校办学层次降成了专科。尽管这种错误认识很低级，但很普遍。其实，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高校办学层次没有变，依然属于本科。”

事实上，即便真是转向“本科职业教育”，学生也并非一味排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大三学生黄欣然就说：“我认识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朋友，他们很专业，也更早地为社会作贡献，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只要能学到真本事，我并不认为职业学校或者应用型高校有什么低人一等的。”

早转早得“利”

当学生的意识开始趋于现实和理性时，地方本科院校的转机正在转型中形成。

就在全国很多“新本科”院校纠结于“要不要转”“如何转”时，2002年升本的黄山学院已经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调整、课程建设、双能型师资队伍结构优化等方面实行了深度的转型。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聘请企业人员为兼职教师、建设校外实训基地……转向应用型的举措纷纷出台，与高职院校办学并无不同。

“总有人热衷于区分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的高下差别。本科院校的办学力量可能会好一些，而有些老牌高职院校本身也有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关键还是要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有能力的毕业生。”黄山学院副校长胡善风说。

汪建利说得更直接：“转型已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必然选择，率先转型的学校势必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得到更多树立品牌形象的宣传机会，因此早日转型、取得先机，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光明日报》2017.02.23.

地方高校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实践探索与发展策略

刘彦军

近年来，为应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党中央、国务院将“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上升到国家战略。因此，把握我国应用型高校发展脉搏，总结建设应用型高校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构建应用型大学建设模式，对应用型高校的持续健

康发展和应用型高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三股力量、两种类型

1.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三股力量

笔者以教育部 1999 年 1 月出台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界，将此前既已开展本科教育的高校称之为“老牌本科高校”，将此后方才开展本科教育的高校称之为“新建本科高校”。据此，笔者将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三股力量分为以下三类，并分别选了若干典型代表举例说明。

第一，部分老牌本科高校及其典型代表

北京联合大学从成立之初开始，专业设置就以应用型为主。学校一直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1991 年，学校被国家教委、中宣部、团中央授予全国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称号。1993 年，北京联合大学时任校长李焯果提出，学校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直接为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坚持面向北京地区城乡企业，面向基层，面向生产一线，培养社会急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该办学定位在北京联合大学 1999 年的第二次党代会和 2001 年制定的“十五”发展规划中得到一再的明确。2002 年，为进一步适应北京市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北京联合大学提出和确立了“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性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定位。2006 年，北京联合大学时任党委书记席文启在《光明日报》上以《如何成功建设一所应用型大学》为题，介绍了北京联合大学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十一五”期间，北京联合大学党委提出了“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十二五”期间，北京联合大学提出“全力建设和谐的、人民满意的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目标。2016 年，北京联合大学又提出了“建设高水平、有特色、首都人民满意的城市型、应用型大学”的“十三五”发展目标。在建设应用型大学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北京联合大学不忘初心，坚持应用型办学方向，没有出现“左右摇摆”“三心二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其发展路径和经验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武汉纺织大学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努力培养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到 2015 年……基本建成特色鲜明的教学服务型大学……到 2020 年，努力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教学服务型大学，为学校二次转型发展，建设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特色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武汉纺织大学作为一所实力较强的老牌本科高校，将办学目标由“教学研究型”转向“教学服务型”，依托行业特色优势学科布局专业，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和社会服务，不仅为行业类院校发展提供成功经验，而且为其他老牌本科高校建设应用型大学提供了经验借鉴。

沈阳大学于 2014 年正式提出转型发展理念，主动对接辽宁新一轮振兴和沈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需要，推动办学思路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转变。2015 年 11 月，沈阳大学被辽宁省教育厅确定为 10 所向应用型整体转型试点高校之一。沈阳市委、市政府也将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全力保障，支持沈阳大学向应用型转变、加快建设成为全国同类院校中的一流大学。沈阳大学作为一所拥有博士点的老牌本科高校，转而建设应用型大学，对其他高校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

第二，部分升本较早的新建本科高校及其典型代表

2000 年，以**南京工程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工程背景的新建本科高校成立，这类高校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培养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道路。2002 年 7 月，“教育部高教司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南京工程学院、长春工程学院、湖南工程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部分工程应用型本科院校发起并成立了“全国工程应用型本科教育协作组”。2007 年，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应用型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搭建了一个交流、研讨、共享的平台。南京工程学院在升本之初，就确立了“建成特色鲜

明的多科性、开放型高水平应用型工程大学”的办学目标。2014年6月，南京工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提出“全力开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程大学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目标。南京工程学院坚持特色发展，升本后继续保留工程传统，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工程素质的培养，为行业类高校建设应用型大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的前身）升本后不久就开始探索和创新为区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式和机制，开展应用性科研，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创新课程体系。2010年，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提出要“实现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转变”，确立了“建设高质量综合性品牌大学”的办学目标。然而，在实际办学中，临沂大学仍以应用型为主，如培养应用型人才、强化实践教学、根据地方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开展产学研合作、为地方提供专家服务、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搭建社会服务平台等。2015年，临沂大学提出了创建“国内知名、区域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办学定位，提出培养“基础理论扎实，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具有沂蒙精神特质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临沂大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历程，进一步显示了应用型大学的魅力。

第三，其他部分新建本科高校及其典型代表

黄淮学院是200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原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原职业技术学院（民办）和驻马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的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2006年召开的第一届党代会上，学校就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社会进步的应用型建设者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人才培养定位。在2011年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目标。2013年，黄淮学院成为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改革战略研究试点院校、河南省首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试点单位。2014年，学院成为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河南省首批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永久举办地等。黄淮学院向应用型高校转变的实践探索，对后发高校、欠发达地区高校、综合性地方本科高校、文科类高校和师范底子高校建设应用型大学提供了借鉴。

2.建设应用型高校两种类型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三股力量，根据其自主性高低，可分为**主动建设**和**非主动建设**两种类型。主动建设是指高校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主动、坚决地探索应用型高校建设路径和规律的办学活动；非主动建设是指高校在政府引导下，或“心不甘情不愿”“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下培养应用型人才或建设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活动。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两个方向、三种战略类型

1.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两个方向

在建设应用型高校的过程中，有些高校的办学和人才培养方向很单一、很明确，就是建设成为（高水平、知名等）**应用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而有些高校的办学或人才培养方向既有应用型，也有研究（学术）型，我们称之为**应用—研究（学术）混合型**（以下简称混合型）。

2.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三种战略

因为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高校具有不同的方向，同时也具有不同的校情，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所采用或适合采用的战略也不同。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战略：一是**整体建设战略**，即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或办学方向，进行综合改革，最终建设成为（高水平、知名等）应用型高校；二是部分建设I战略，即以**应用型为办学方向**，进行渐进性局部改革，最终建设成为应用型高校；三是部分建设II战略，即以**混合型为办学定位或办学方向**，进行相对有限的局部改革，最终建设成为具有一定应用型

特征的高校。总之，一个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定位）和其为建设应用型高校而进行改革的范围和规模，是衡量一个高校所采取或应采取战略的重要标准。

北京联合大学、黄淮学院等高校明确定位为应用型，在建设时有理论论证和完整的顶层设计，改革范围涉及广泛，不仅包括人才培养，而且还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应用型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师生普遍接受、广泛参与。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所高校采用的是整体建设战略。一般来讲，整体建设战略适合学校领导、师生对转型发展有一定的认识，接受度较高，尤其是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有一定的前期探索和建设经验的高校。

南京工程学院定位为应用型，在建设应用型高校时进行的改革长期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如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实践教学、校企合作育人、产学研合作等，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较系统和深入。相应地，对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应用性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不够突出。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南京工程学院在建设应用型高校时采用的是部分建设 I 战略。另外，还有一些高校在建设应用型大学时选取了部分院系或专业（群）进行改革试点，如武昌工学院，该校的办学目标是“建设成为以工学为主、特色显著、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应用技术型大学”，但该校在向应用型转变时选取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环境设计两个专业作为试点，其采用的也是部分建设 I 战略。一般来讲，如果学校对建设应用型高校的认识和准备不够充分，或有一定认识和准备，但经验、信心不足，可选择部分转型战略，并且要有计划、逐渐地向整体建设过渡。

武汉轻工大学的办学目标是“建设特色鲜明、国内知名、轻工食品类优势学科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高水平多科性大学”，“到 2025 年，学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本科高校前 20%”。2014 年，武汉轻工大学选择了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和农业推广硕士（农村与区域发展）进行应用型改革试点。由此可以推断，武汉轻工大学是想在保留学术型教学传统和优势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应用型教育，从而形成两者和谐共存的共生状态，其采用的是部分建设 II 战略。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策略

上述三种建设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战略，因其办学方向、改革涉及范围不同，因此其实践策略也不同。

在治理结构方面，整体建设的高校应尽早建立理事会（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等制度，而部分建设 I 和部分建设 II 高校应适时建立；整体建设的高校和部分建设 I 高校的理事会（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等制度大体相同，而部分建设 II 高校的理事会（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在作用使命、代表来源等方面会有不同；另外，部分建设 II 高校在扩大二级院系自主权方面也会与其他两类有较大区别，如学术管理权问题。

在人才培养方面，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并不是应用型教育的专利，部分建设 II 高校在培养学术型人才时也可以借鉴，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更多地产生于应用的语境中。但毕竟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规律不同，部分转型 II 高校可能会办出与众不同的效果，但更需防范和提早应对在应用型和学术型之间切换不畅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分裂危险。

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一般来讲，对整体建设和部分建设 I 高校，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尤其是地方的社会需要）的多少、类型和趋势，去撤并、改造、保留、新增专业，部分建设 I 高校可选择产学研合作密切、服务能力较强、应用性特色鲜明的专业（专业群）进入试点，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进行渐进建设。部分建设 II 高校除根据上述策略进行建设外，还需根据学科专业的学术基础和领先程度、学科发展规律和趋势等选择需要保留的学科专业，切不可急功近利，草率地根据就业率、报考率等指标将其粗暴裁撤。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对整体建设和部分建设 I 高校，需要建立一支专、兼、聘有机结合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尽可能地要求每位教师都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多面手；而对部分建设 II 高校，可以采用建立双师、双能型教师团队的方法解决。

在科学研究方面，整体建设和部分建设 I 高校，应重视应用型研究，需紧盯应用技术的前沿；而对部分建设 II 高校，还需紧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另外，部分建设 II 高校还可充分利用其内部的学术型资源，与应用型资源合作开展协同创新研究，以及科学技术的开发转化研究。

在社会服务方面，应用型教育一般是直接服务社会，而学术型教育一般是通过媒介或转化机制

间接服务社会，各类高校均可加强社会服务功能，但部分建设Ⅱ高校需要有定力，尊重学科“内生性”发展规律，保持学术型教育的独立性。

在办学条件方面，打破学科专业的界限，统筹使用各类实践教学资源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各类学校均需大力去做，然而学术型教育的实践教学资源与应用型的实践教学资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通互用，但可共享的程度有限，这是部分建设Ⅱ高校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北京教育》 2017.04.14.

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面向世界培养工程型创新人才

——以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为例

李欣欣 刘立 赵志毅

人才培养对国际化课程体系的需求

大学课程体系是指大学根据本校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和构建的，是由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一组课程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课程体系是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大学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和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桥梁。因此，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构建是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一项关键任务。国际化课程体系是在本国富有特色的教育理念和积淀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吸收国际共同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成果，通过人类有效知识和文化的融合，实现学生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先进性和国际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国际化相融，以及新时期的高等工程人才培养需求，为培养学生具备面向世界的视野和能力，我国高等教育在教学设计框架中需要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国家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网络强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推动着我国的科技、教育、生产制造等必须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为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支撑服务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构筑先发优势，在未来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中占据战略制高点，迫切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大批新兴工程科技人才。同时，新时期培养工程型人才需要高校积极面对《华盛顿协议》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2016年6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华盛顿协议》签约组织的认证标准普遍采用“产出导向(outcome-based)”的基本原则，即将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潜能表现作为衡量教学成果的依据，并以促进其持续改进作为认证的最终目标。如何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体现认证的最终要求，是摆在所有工程教育高校面前一个紧迫的问题。

在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景与行动”以及教育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部署下，高等教育也担负着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新使命。在整体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中，注重将沿线的国家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经济发展和社会现状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实施重点和合作机制等相关内涵融入到整个专业的教育教学中。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高校必须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与能力去分析与之直接接触环境以外的世界，能够使学生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看问题的角度差异，能够使学生与不同的听众进行有效交流，并将其理念转化为适当的行动。与此同时，高校还应积极培养学生从事国际交往所必须具备的爱国、正直、专业精神和尊重多样性等核心价值观，互相交流、团队合作、计划组织、承担责任、考虑客户、不断创造、持续学习和更新及时等核心胜任力，以及富有远见、领导力、赋权、绩效管理、建立信任和决策能力等管理胜任力。需要将全球胜任力的培养目标融入到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及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之中，并使之能够在专业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逐步得以实现。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培养我国的工程型创新人才是新时期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面临的时代要求。课程体系改革是成功完成新时期工程人才培养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具有挑战性的关键工作。

立足本土多角度多层次构建立体国际化课程体系

目前，高校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由四对课程要素关系组成，分别为：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以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根据学校的类型和层次，各要素之间形成不同的比例。典型的课程体系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以源于前苏联的、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的“层次化课程体系”，特点是循序渐进、逻辑性强，缺点是学生知识面窄，人文修养和综合素质较差。另一种是以计算机软件系统模块思路设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以“核心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程、选修课程和核心课程三个模块构成的课程体系。特点是能够突破学科专业领域的界限，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需求。不足之处是过于追求全面发展而失去课程体系的整体功用、价值和特色。

在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的规划中，既要尊重历史，也要体现新时代教育的精神。既要注意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课程之间的连贯性，也需要注意避免完全套用欧美大学的趋同化。因此，在课程体系国际化的思路中不能“一切拿来主义”，要充分考虑国际化课程与本土课程之间的融合与互补关系。构建基于学校专业特色和历史的具有国际化要素的课程体系，并结合自身特点去量身制作。

基于学校特点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探索

北京科技大学的课程体系从历史渊源上属于“层次化课程体系”，源于前苏联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1952年，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课程体系是依据莫斯科钢铁学院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等设计和实施的。主要特点是根据钢铁工厂的需求来设置具体专业，依据专业的培养目标来确定课程体系。目前，学校的课程体系为“层次化课程体系”与“模块化课程体系”的结合。既体现了专业课程的循序渐进，也兼顾了模块化设置开拓学生视野的功能。这样结合的好处是既没有丢弃学校循序渐进地培养专门人才的逻辑思路，也体现了新时代对于通识能力培养的要求；不足之处是在不能突破学分总数的前提下，虽然拓宽了视野，但代价是专业课程学时的整体减少。同时，体现出的问题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大大滞后于教学体系的改革。

北京科技大学是2010年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首批实施高校。学校的高等工程师学院以培养未来工程师为目标，借鉴世界先进国家高等工程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实践和创新”为特色，致力于培养“厚基础、宽专业、强实践、重创新、懂管理”，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满足国家现代工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和行业领袖。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主要从国际化课程设置和国际化教学内容充实两方面进行。在课程设置的改革中致力于结合培养工科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工程素质。针对当前国际工程师所普遍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学术训练、工程标准（涵盖当地法律及工程伦理）、终身学习能力方面，以能力模块的结构体系进行设计，着重对学生进行工程问题分析能力、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设计能力、团队合作、项目管理、交流与展示能力、跨文化合作能力、跨专业合作能力、影响力、战略规划、国际合作以及工程管理能力方面的素质培养。同时，结合层次化课程体系针对工程能力的特点进行系统化培养和逻辑性培养。

针对课程体系的四对要素，学院将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以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设置合理的比例关系。使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并非是在原有的课程体系中增加几门外语授课的课程，而是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在四对要素中充分融合国际化的外教课程，全面提升学生素质。

在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中，以基础英语、专业英语和专业工程基础课程以及国际前沿知识讲座为主线，在课程设置的同时，重视在原有课程的框架下充实国际化内容，循序渐进地使学生从语言掌握到国际工程基础知识的掌握了解。在“基础英语”环节进行分层次教学，通过对学生进行英语水平评估，确定学生的课程起点。对不同英语基础的学生实行不同等级的英语课程审核和准入制度，以有效节省课时。分层教学法是在学生知识基础、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教师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教学，从而达到不同层次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分层教学法既能使所有学生达到基本的语言能力和国际化工程素养的要求，也能使英语学习较好的学生得到进一步发展，

使所有学生从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普遍提高。在第一学年以分层教学的方式开设“基础英语”课程，使学生基本英语能力保持和提高。第二学年开设以学术能力培养为导向的“通用学术英语”课程，将学生英语学习聚焦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英语”的应用方面，使其具有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第三学年由校内具有海外背景的教师开设“专业英语阅读与写作”课程，使学生具备本专业内英语词汇并能够阅读专业英文期刊论文，同时训练基本工程表达能力。第四学年撰写毕业论文之前开设“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课程，针对科技论文写作，使学生能够直接在毕业论文的撰写中应用，并拓宽学生文献阅读的能力和范围，使学生具备初步的全面交流能力和工程能力。同时，根据专业方向邀请国外的教授和工程师来学校进行专题性报告，一方面，开拓学生视野；另一方面，在面对面的环境中进行交流锻炼。

在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设置时，从系统培养的角度实现连贯的国际化培养。在教学手段方面利用网络技术，聘请美国高校和大型跨国企业的工程师，开设网络实时授课的国际性课程。作为工科专业均可选修的专业选修课程，学习和讨论作为国际工程师需要了解的国际工程常识、文案撰写、国际组织、国际企业管理规范以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等。学生通过课程了解国际企业的规则，与国际工程师交流工作方法并具备初步的能力，使学生在校学习与毕业后在国际化企业中工作之间能够有所联系。学院以连续开设 10 个学期的国际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程，选课率 80% 以上。利用学校资源，在大学一年级第三阶段开设为期 3 周的“英语口语实训”课程，全外教授课，进行全天的基础英语强化训练。在大学二年级第三阶段，开设“航空用新合金开发”“材料与环境”“战略与危机沟通”等前沿性国际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开展，集中讨论与本学科专业领域相关的国际上共同关注的前沿性问题。

在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结合上，主要体现了以面向世界的形式开展生产实习和课程设计。学院创设“智能制造班”和“机器人班”，设置与竞赛、课程设计等直接相关的理论性课程，用以竞赛参赛指导和课程内容设计实训。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运用知识以满足设计要求的能力。开设全外教授课的“智能制造基础”课程，理论授课与产品设计融合在一个课堂中，使学生直接参与到美国高校和企业中，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为学生提供 3D 打印和激光切割等实验环境，指导学生开展产品设计及测试。除了课程的设计制作作业之外，在学习两年理论课程后，学生赴世界 500 强跨国企业艾默生等公司进行联合培养，接受国际企业规则培训，在企业的指导下开展实习、课题研究等实践活动。倡导绿色工程理念，引进英国剑桥大学 CES EduPack 教育软件资源。使用英国剑桥大学工学院最新教材《材料与环境》(Materials and the Environment) 作为课堂教材，充实国际化的教学内容。

除了采用请进来的方式在校内设置国际化的课程之外，还要让学生走出去切身感受国外教学学习环境、理念和文化，课程设置中增设了海外访学及联合培养等项目。通过暑期访学，在海外高校进行专题科技课程学习，包括材料选择、材料设计及智能电网等国际热门或前沿科技知识。同时，授课课程与动手实践结合，如参观海外高校实验室，操作实验室设备完成学习内容。了解访问高校所属的国家文化及初级语言知识。开拓国际视野，提高国际化学术学习和交流能力。学校定期组织召开工程教育国际化会议(论坛)，邀请世界知名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国际学术环境和学术交流机会，作为课程体系设置国际化内容的有效补充。学生在国际会议的学术交流中，学习国际化会议学术行文规范，了解国际前沿科研方向，理解国际知名学者研究思路，学习国际学术报告表达方式，同时开阔学校教师的科研国际视野，增强国际化学术交流能力。

开展实质性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

学院开展实质性合作，与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大学(原莫斯科钢铁学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一带一路”行动规划为准绳，从学生培养和课程设置方面开展积极合作。学院连续组织俄罗斯暑期访学团，学生利用暑期在俄罗斯进行两周的专业学习、俄语学习和文化交流活动。与该校开展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大力促进两校教师在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交流。

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需要有完整的上层规划，较为自主的课程设置权限，学校教务部门、学院

和国际交流合作部门持续的政策支持，根据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调整以及相应的经费支持。以面向世界培养工程型人才为导向的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是所有高校在工程教育中的关键环节。学院在六年多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搭建出了具有国际化要素的、具有学校特色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并搭建国际化平台用来支撑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带动国际师资、教材以及国际化教学方法开展工作，以“层次化课程体系设置”和“模块化课程体系设置”结合的课程体系为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分层次、递进式、多方位的国际化课程的选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了英语语言能力，开拓了国际化视野，增强了国际学术报告能力和写作能力，建立起了对国际企业工程规则、环保、质量监控等方面的意识，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北京教育》 2017.04.01.

重庆 10 余所市属高校试点转型 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重庆市教委发布消息，全市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提升和成效，其中，10余所市属高校试点转型。

据介绍，全市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2.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3.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5.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基础教育方面，11 个区县接受国家基本均衡评估认定，全市基本均衡区县达到 65%；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完成，在园幼儿普惠覆盖率达到 75%。

在职业教育方面，中职学校与本科院校对口贯通“3+4”分段人才培养试点规模招生并注册 746 人，“五年制”招生注册 1597 人；遴选 8 个紧密对接区域经济需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项目。

此外，全市高等教育水平实现新提高，部市共建高校达到 3 所，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增加到 140 个，10 余所市属高校试点转型。

《华龙网》2017.02.03.

美国南加州大学战略规划体系研究与启示

陈威 姬懿

所谓“谋定而后动”，高校战略规划是对学校长远愿景勾勒和发展的路径设计，关涉全局、意义重大。当今全球顶尖大学诸强中，既有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历史悠久的数百年名校，也有香港科技大学等资质年轻、拔地而起的后起之秀。仔细研究这些强校成长史，其发展并非匀速，而是都能从中提取出一个或者多个高速成长的片断，其背后都是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强力拉动了学校短期内综合实力的提升。作为一种前瞻性和先导性文本，战略规划旨在为组织提供一套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思考逻辑和行动框架，从而使其利用环境中的机会和自身发展优势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本文选取南加州大学（以下简称“南加大”）的战略规划体系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南加大地处洛杉矶市，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是美国西岸最古老的私立大学和获得联邦政府经费最多的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也是全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其学科全面、实力均衡，与我国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种子选手”C9高校学科布局结构极为相似。二是南加大并非具有战略规划的悠久传统，其规划体系是由一位富有远见的校长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并且实施成效显著。这与我国高校目前面临的冲刺任务高度契合。三是南加大从1994年第一个战略规划出台，到1998年执行评估报告，到2004年学术发展规划，到2011年远景规划，战略规划体系持续演进、形式多样、流程合理、日趋完善，为我国高校各类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参考。

制定背景

1、内部环境。南加大战略规划体系的建立主要得益于第十任校长斯蒂文·桑普（Steven B. Sample）。在他的领导下，南加大从1994年起，分别制定和实施了1994年和2004年两个增强南加大的重大战略规划，2011年则制定了一个远景规划，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战略格局。长达20多年的战略规划的坚持实施，助推了南加大跨越式的发展，使其获得并巩固了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位。

2、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南加大战略规划的制定是由所处环境决定的。1994年、2004年南加大面临着重要的挑战。学校预测进入21世纪后，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将不断加剧，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校将面临更多监管、问责的压力；研究经费的重点开始从基础学科转向关于社会问题的应用型研究；洛杉矶地区由于社会治安等问题在吸引学生和教师方面处于劣势。为了应对挑战，保持和提升学校竞争力，南加大制定了1994年和2004年的战略规划。2011年战略规划的出台则与前两者不同，南加大看得更远，希望抓住全球化、信息化的机遇，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使南加大成为环太平洋和亚洲、拉美地区新兴社会智慧、文化和创造的源泉。

制定过程

1、学校组织架构。战略规划是顶层设计，是凝聚人心、凝聚共识的过程。想要厘清南加大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首先需要了解学校的管理架构，这是战略规划的依附所在。从《南加州大学章程》中可知，南加大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约由55名董事组成（包括常务、荣誉和不投票的退休董事）。董事多半是由国内、国际大型组织的高级主管、杰出校友以及学校管理高层构成。董事会下设11个常务委员会，包括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大学发展委员会、校友事务委员会、校园规划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

2、规划制定的操作流程。第一，1994年规划。1994年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时任校长的斯蒂文·桑普在1993年提出要制定战略规划，同年3月发布全校文件，要求各单位9月提交各自的规划文本。之后由筹划指导委员会负责文本的撰写和组织，完成草稿后向全校公开并向董事会汇报。在经过全校范围的讨论修改后，1994年6月，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战略规划。第二，2004年规划。2004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历时两年。2002年7月，学校决定启动制定战略规划；2002年9月，学校成立了战略规划委员会（Strategy Planning Committee）；同年12月，战略规划委员会明确了学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并进行了相应的评估。2003年3月，战略规划委员会起草了规划核心理念，并邀请了大约100位相关专家对这些核心理念进行讨论和修订。同年6月，在核心理念得到完善后，战略规划委员会又邀请了约100位年轻教师进行再次讨论，以期获得不同角度的修订。同年9月，学校将战略规划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在委员会下设置六个分委员会：教学、外部关系、财务、全球化、国际组织和研究成果应用委员会。六个分委员会分别提交修改意见，之后战略规划委员会及六个下设委员会起草了规划的草稿。2004年3月，草稿向全校范围内公布，教务长召集教师进行广泛讨论，并收集各方意见和反馈。同年7月，根据反馈意见对草稿修改形成修订稿。同年9月，规划文本获得学校董事会正式通过。第三，2011年规划。在2004年规划制定的基础上，2011年规划的制定更为流程化，也更为明确。此时战略规划的负责人已经变为了教务长，这个管理体制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制定的组织机构为战略规划委员会，制定的流程与2004年规划制定时“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委员会起草初稿—全校公开讨论—董事会通过”的制定流程一致。

规划内容

1、《南加大战略规划》（1994年）。1994年6月，南加大发布“战略规划”。这份战略规划由以下四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从全局视角审视南加大的整体环境，阐述了当时学校面临的威胁、机遇、优势和弱点。第二部分，确定了南加大的战略目标，即未来十年能够占领学术卓越的位置，成为领先的美国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之一。第三部分，制定了实现发展目标的四项战略行动。第四部分，结合资源配置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根据既有的战略目标、方案和策略，规划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已经开展的行动、下一年的行动、接下来两年到三年的行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始终重视资源的配置、利用、整合。

2、《南加大1994年战略规划评估报告》（1998年）。南加大1998年发布了《南加大1994年战略规划评估报告》，回顾和评估规划实施情况。报告主要由四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报告回顾了1994年的战略规划并肯定了规划实施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报告回顾了战略规划的实施情况，高度肯定了1994年的战略行动。第三部分，重申了实现规划的四项新战略举措，即通讯、生命科学、艺术、城市范式。第四部分，报告提到了将来可能会制约南加大发展的几方面因素。

3、《南加大学术发展规划：构建21世纪大学的战略能力》（2004年）。南加大2004年发布了《南加大学术发展规划：构建21世纪大学的战略能力》。新规划分为以下五部分。第一部分，高度评价了大学在其前十年规划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明确指出南加大制定和实施新规划的重要意义，并且阐述了南加大未来的前景构想。第二部分，陈述了新发展时期学校的三个战略重点，即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全球知名度、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第三部分，是新规划的核心所在，分析指出发展上述能力的优势基础，开发战略能力，并部署发展相应战略能力的第一年行动计划。第四部分，强调了维系核心价值的重要性，以确保大学发展依旧保持特色并遵循传统。第五部分，新规划强调对现有举措的评估、重整、发展和提高。

4、《南加大战略愿景：行动与雄心同步》（2011年）。在长达17年实践之后，南加大已经基本形成了战略规划的传统，在具体执行层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积淀。为了更进一步推进学校发展，南加大在更高层面提出了宏大构想，于2011年推出了《南加大战略愿景：行动与雄心同步》。规划由四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梳理了南加大的建校史和发展历程，并重申了核心价值观；充分认可南

加大的传统结构和后续革新，分析南加大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第二部分，陈述了大学发展的前进之路。一是为适应飞速变化的世界改变教育；二是创造重大学术成果；三是联结个人与世界。第三部分，则细致介绍了上述三条道路：一是在为适应飞速变化的世界改变教育方面，从追求学术卓越、拓宽入学渠道、实行问责制等着手开展相应的战略行动。二是在创造重大学术成果方面，通过翻译研究、创造性工作与实践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通过采用新方法新步骤、开发新领域、使用灵活结构创造成功的条件。三是在联结个人与世界方面，强调全球与地方的结合，实现两者的良性渗透；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相互理解。第四部分，新规划召唤实现理想愿景需要的行动。

启示

1、大学的使命和愿景至关重要。南加大的大学章程、战略规划、学术规划、远景规划都参照南加大的使命制定，并且在地区、国内和国际上都明确大学现在和将来的定位。使命和愿景是引领高校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指南针，在遵循使命和愿景的基础上，参照往期规划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或制定新的规划，提高了规划的权威性、可操作性、科学性。明确学校肩负的历史使命、明确战略规划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引领地位，能较好地保证学校发展方向的正确性。

2、文本清晰简洁，上下认识统一。规划文本简洁明了，南加大规划篇幅都不长，有利于规划文本的传播和受众接受；在制定过程中，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沟通充分，统一认识是规划成功的关键；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学校主要领导明确表示战略规划确定的优先顺序将成为今后高层决策的指南；学校设置了许多激励措施来促成主要目标的实现；学校明确各学院院长有责任使自己的目标与学校的战略规划保持一致。

3、广开言路、建立实时反馈机制。设置及时、客观、公开透明的反馈和评估，能及时监控规划的实施情况并作出调整。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不少规划之外的事情，需要设置一定的保障措施，收到实时的反馈和意见后作出相应的改正和处理。这有利于引导各学院及其他子系统关注学校战略，激发师生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积极性和热情，举全校之力促进战略的顺利实施。

4、高效整合资源、善用地理优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利用地区优势，开展特色项目有利于最大程度实施既定计划。在整合地区资源方面，南加大积极开展与洛杉矶其他高校的合作，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一起建立了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旨在促进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转移。此外，如何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现实结合以打造校园文化品牌，也是大学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北京教育》杂志 2017.4.14.

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培训理念及启示 高喜军

大学领导者及其领导力

1、大学领导者

大学领导者是大学组织成员中的关键少数，对其大学的办学定位、发展战略、育人理念、人才培养、创新精神、学校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方面，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外外部环境，为实现大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大学领导者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

教育家的标准，不断强化领导力，才能引领学校改革事业健康顺利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学功能的拓展，办学规模的扩大，师生利益诉求的增多，学校与外部交往的日趋紧密等，都对大学领导者的把握方向、驾驭大局能力、应对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统筹资源协调各方的能力、团结激励探索创新的能力等，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高校领导人员领导能力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必然要求。

2、领导力

领导力是针对领导者而言的，表现为一种个人的能力或一种集体的能力，是领导、引领、影响他人的能力，即领导者个人及领导群体把握组织的目标使命，并动员、影响组织成员实现共同目标使命的能力或能力体系。领导力从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这一点对大学组织更为明显。大学组织领导者的领导力，既体现为领导班子集体的领导力，也体现为党委书记、校长及其他班子成员个人的领导力。有专家认为，理想的大学领导者应当是教育家、政治家、学问家、管理专家、社会活动家等的统一，即他应该讲政治、懂教育；应该善谋战略、把握大局；应该是学术专家，能与教师教授群体对话沟通；善于经营管理，协调处理政府、社会和大学内部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大学组织内外对大学领导者的期待及领导者个人所承受的工作压力。

对于大学领导者的领导力是否带有先天的因素，一些专家学者对此存在着争议。但是，对领导者通过实践锻炼、培养、环境的影响等，对领导力的展示及提升非常关键。因此，领导力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通过外界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化的，这个外界因素包括工作积累、岗位锻炼、完成复杂任务、学习培训等，其中组织针对领导者的领导力专门化教育培训，也是提升领导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及其培训理念

英国是公认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英国的大学最主要的特点是“自治”，英国政府认为对大学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让大学以各自独特而有效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在坚持大学办学自主特点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注重加强对大学的管理，管理的加强并非借助行政命令，而是依靠拨款、立法与评估等非直接方式，强化对大学的监管。例如：通过制定实施相应的政策、法案等对大学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高等教育研究院及通过实施研究卓越框架(REF)、教学卓越框架(TEF)等，实现对高等教育的引导、服务和监督等。

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Leadership Found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简称LFHE)，即是在政府支持下的，通过强化对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培训、取得教育发展理念共识进而对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影响的一个途径。其培训理念、关注问题及具体实施手段等，对我国高校领导人员能力素质提升等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的基本概况

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是适应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由部分高校的副校长自发组织起来，向英国政府提出自我管理大学、培训大学领导人的诉求而建立的。该基金会得到了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资金资助。成立之初由包括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等供资机构提供培训启动资金，通过个性化培训，有效提高高校领导人的素质，为英国高校转型和变革储备有发展潜力的领导者，有效引导和支撑英国高校的战略规划向战略管理的转变。该基金会是拥有慈善组织地位的非盈利型机构，其核心任务是提升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导力、质量和管理水平，由英国大学校长协会(Universities UK, 简称UUK)和英国高等教育协会(Guild HE)共同管理。目前，经费15%由政府提供，其他经费来自会员缴费和培训收费。

2、培训理念

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认为，高校领导者需要专业化发展、要高度重视培训需求调研和高校愿景和规划建设等方面，并以此来设定培训内容。在领导观念上，强化大学整体机构的行为和能力以及各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通过对大学领导者个体的培养，建立和增强整个机构的领导力；在

领导人选上，提倡领导人种族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广泛性、社会阶层的代表性；在培训重点上，重视大学领导者战略思维的培养，提倡领导者要有远见卓识，要制定好 3 年~5 年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通过各职能部门的运作实现战略目标；在培训方法上，以实际案例为引导开展全方位的个人培训计划，针对个体运用技术性方法、行为分析方法、360 度反馈等发现受训者的不足，有的放矢地实施培训工作，提高所有受训人员的综合领导力和环境适应能力。

3、培训特点

一是**个性化**。英国超过 90% 的高校都以会员单位形式加入了该基金会，按照学校规模每年需缴纳一定的会费（培训时另外收取培训费）。该基金会的旗舰项目—高层管理项目（TMP），每次接纳培训的数量只有十人，一般培训时间会持续 6 个月。培训过程中，培训咨询师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几的方式全程参与，摸清领导者的培训需求以及对领导者的弱项做出诊断，形成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并实施。二是**实操性**。培训关注领导者在实际工作情境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如怎样做出正确决策、复杂人际关系的处理、危机应对等。培训中重视参训人员工作经历中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的共享，通过总结具体的案例提升领导能力。三是**战略性**。领导力基金会重视培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通过拓展高校领导人的综合素质，以促进高等教育变革，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四是**多样性**。除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危机应对及个性化培训内容外，还根据大学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需要，开展金融、法律等方面知识的培训。此外，还关注对少数族裔，如女性领导者群体的培训。

对我国高校领导人员培训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与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培训相比，我国高校领导人员的培训，主要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组织实施，应该说更全面、更系统、具有时效性，具有中国高等教育领导体制及干部管理体制下培训工作的独特优势。高校领导人员的培训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实践，已经形成比较规范的培训体系和运行机制，受训人员数量庞大，培训内容包括时政理论、教育政策、领导素质和管理技能等，内容丰富，培训效果比较明显，对促进高校领导人综合素质提高、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大局、促进学校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的培训工作还存在方式单一（培训模式主要是讲授式培训）、问题聚焦不够（内容散且深度不够）、个性化关注不够（整班大班式培训）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并借鉴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的培训理念，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校领导人员领导力，建议对有关工作加以改进。

1、加强对高校领导班子领导力状况的测评分析

目前，高校主管部门对高校领导班子的考核主要结合换届、干部调整及年度考核等进行，这种考核目的性比较直接，就是对班子成员的去留、人员调整晋升以及分出优劣等级等得出结论，而对班子成员作为一个团队以及每个成员的潜力发挥和领导力状况，及其对所在学校未来发展的影响考量不够。建议结合高校特点，完善高校领导班子及成员的考核测评指标体系，力求全面、精准体现高等教育的领导力特征。可先行组织开展高等教育领导力的党建课题研究，找准考核高校领导班子及成员领导力的测评要素，为领导干部的选配及能力提升的培训等提供依据。

2、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提升领导力方面的作用

与专门的培训机构不同，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高校联盟可以在提升领导力方面起到独特作用。有研究发现，大学的高层领导者的直接沟通至关重要。大学高层领导者，如校长，都愿意与其他领导者坐下来探讨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喜欢面对面接触沟通，喜欢实际的经验和指导。因此，要为大学领导者的沟通创造机会，促进同一个层次的领导者之间经验的分享。建议探索在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指导下，建立不同层面的大学联盟、协会或团体，通过这些组织的作用，传递、激活及提升大学领导干部的领导力，进而引导深化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健康发展走向。或利用和发挥已有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平台作用，强化大学领导力经验分享和培训的内容。

3、改进现有培训模式，强化高等教育领导力培训

一是应瘦身班级规模。近些年，北京市领导干部培训班主体班次规模过大，有的班次每期人数近百或过百人，影响学习和培训效果，建议每个班次控制在 50 人以下或更少。二是注重培训的个性化需求。近年来，北京市举办的局级进修班每期开班前都做培训需求的问卷调查，主要涉及“参加培训学习最希望破解的理论困惑”“最希望解决的实践难题”“提供一个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供学习研讨交流”3 个问题，此做法相对以往有很大改进，但被培训者的个性化需求仍挖掘不够，培训内容与个体需求的契合度有待提高。应加大培训前期的研发力度，提高培训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三是加强师资建设。除聘请理论专家、行政官员、专家学者授课外，对提升高校领导人员领导力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校领导层人员（包括现职及离职人员），建议遴选一批高校领导者（涵盖不同领域分工的成员）作为领导力培训师骨干。此外，应探索培养一批具有领导力培训资质的职业培训师和咨询师，强化在培训过程的个性化需求调查和个体辅导。四是注重分享式的领导力培训教育。英国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尤尔特·伍德里奇发现，当问大学领导者“其最重要的学习经验来自哪里”时，42%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学习经验来自于工作，特别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22%的人认为来自于自己的偶像、导师或其他的典范；20%的人认为来自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或经历的困难；16%的人认为自己的重要学习经验是来自于传统的教育和培训。因此，高校领导人员的领导力培训，应使每个被培训者有机会扮演培训者的角色，分享各自的经历、挑战、成功，特别是分享和感受各自经历的困难、失败和错误，后者更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勇气，或许这也是领导力测评的一个视角。

《北京教育》杂志 2017.4.17.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语院校发展参考》

2017年第1期（总第18期）（2017年5月3日）

征稿启事

《外语院校发展参考》的办刊宗旨为“宣传政策法规、提供决策建议、反映发展动态、搭建交流平台”。本刊希望成为校内各单位展示工作成效、探讨发展问题、交流经验做法、互相借鉴沟通的平台。竭诚欢迎各单位和个人就高校、院系和机构的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等问题向本刊赐稿。来稿体裁可以是活动通讯、成果和机构简介、调查报告、学术论文等。

顾 问 明国辉
主管领导 李克勇
编 辑 教育发展研究院
报 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处，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领导
发 送 校内各单位
地 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33号 邮政编码：400031
联系电话 023-65382273
E-mail cwfgc@sisu.edu.cn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